

清末民初的剪辮風潮及其所反映的 社會心態

張世瑛

摘 要

歷來鑽研清季革命史的研究者，都將剪去髮辮視為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專門探討剪辮風潮的相關論文亦多，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內容的詳略或有不同，所持的觀點卻大同小異，都將當時人的剪辮動機，解釋成是反滿種族革命的單一表述，這幾乎已是不證自明的常識，少有學者提出質疑。不過，近年來的一些研究，特別是美國學者孔復禮（Philip A. Kuhn）對乾隆年間叫魂案的分析，卻強調看似雷同的剪辮舉動，其實蘊藏著複雜的社會心態，以往的研究可能過度簡化了剪辮行為背後豐富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本文是從以下幾個面向，重新詮釋剪辮的意義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一）傳統漢族男子髮式的政治及文化意義，包括先秦儒家文化對髮服禮制的解釋，以及在中國小傳統中對頭髮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的解讀。（二）晚清維新派人士對剪辮問題的態度。（三）晚清海外華人的剪辮行動。（四）辛亥革命期間國內有關剪辮的言論及行為。

事實上，從晚清剪辮論述及具體實踐的互動過程中，我們看到一種嬉笑怒罵、玩世不恭的時代風尚，許多剪去辮子的宣傳者及實行者，並非用橫眉怒目、感時憂國的嚴肅態度，在向滿清政府挑戰，而是以各式各樣的嘲諷笑聲，澈底顛覆既有的權威，藉由身體的各種扭曲、誇張與醜化的表現，呈現了這個新時代的革命精神。更重要的，在清末民初這個傳統價值逐漸崩解的轉型時代裏，剪辮也是躋身新派人物的一種姿態或表演，這些時髦男子將辮

子作為時髦行為的伸展臺，藉由審美意義的展現，達到另一種挑釁權威的目的。過去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剪辮背後，還有許許多多隱而未顯的心理動機，包括時尚流行的展現、審美意識的傳播、妖術的歷史記憶、性別的倒置及階級的關係等等，而正是在這些因素錯綜複雜的交融互動下，共同影響並左右了晚清剪辮風潮的動向。

關鍵詞：辛革亥命、剪辮易服、反滿革命象徵、社會心態、髮服禮制。

The Pigtail-Cutting Turmoil and the Related Social Attitud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hih-ying Chang^{*}

Abstract

Past studies on the late Qing revolutionary history repeatedly regarded the cutting of pigtails a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for its being an undoubted expression against a most potent symbol of the Manchurian rule. But this somewhat simplistic observation has recently been challenged by Philip A. Kuhn. On the strength of his study of the event of soul-stealing during the Emperor Chien Lung period, he proposed that the seemingly simple act of pigtail-cutting actually entailed rather complex social sentiments, as innumerable matter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were behind the very act concerned.

This paper tries to look at the issue from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1)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the traditional hairstyle of the Han peopl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explication as found in the Pre-Ch'in Confucianism and in the views of the common people; (2) the attitudes of the Reformative School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 (3) the movement of the cutting of pigtail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4) the reaction of local peoples in China towards the cutting of pigtails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s a matter of fact, those who advocated and performed the plait-cutting often held a cynical and sarca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matter, taking it as one of their ways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n high. Instead of taking a serious frontal approach to fight against it, they preferred to subvert it by making a caricature of it through the use of exaggerated and twisted methods in treating their pigtails. In so doing, their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acts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a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the time. Furthermore, the act of cutting one's pigtail could mean symbolically being in the "new trend," which was no less another way of challenging the hated authority.

To sum up, most studies of the past often overlooked such implicit motivations as the pursuit of new fashions, the spread of new ideas of beauty, the memory of evil arts of the past, the subversion or reversion of the roles traditionally assigned to the two sexes and thos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classes. All these motifs were far more important ingredi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igtail-cutting.

Keywo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igtail-cutting, the change of clothes fashion, the symbol of anti-Manchurian rule, social attitudes, the ritual of hairstyles.

清末民初的剪辮風潮及其所反映的 社會心態^{*}

張世瑛^{**}

一、前言

辛亥革命向來被民國史家視為中國現代史的起點，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全國絕大多數的省份紛紛響應，革命黨人在南京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清廷迅即宣布退位；一時之間，期待許久的革命果實，彷彿就像是放在餐盤上般的唾手可得。雖然，辛亥革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但在當時人的眼中，它從來就不是一場成功的革命。¹而二次革命後流亡海外的孫中山及黨人們，重整革命隊伍，再舉革命大業，經過十年的努力，直到彌留之際，孫中山縈繞不忘、念茲在茲的，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句話同時包含了時間的辯證向度與革命的合法性問題，既然革命的完成是個不斷延宕的過程，為了使日後的討袁戰爭、護法運動及國民革命運動建立合法性，在邏輯上，辛亥革命就註定不是一場成功的革命，它的存在只是在為下一波的革命高潮預留伏筆。

辛亥革命雖是近代中國研究中的重要顯學，歷史學家卻又難掩對其虎頭蛇尾、未竟全功的遺憾與失望。中國大陸學者向來服膺馬克斯主義史學的觀點，將辛亥革命定調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²縱使是較持正面看法的臺灣學者，也不得不承認，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9年6月1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9月8日。

** 國史館協修

1 例如，1921年瞿秋白（1899-1935）在提到辛亥革命時所形容的，那次革命的結果只不過是「成立了一個括弧內的『民國』」。見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1卷，頁29。

2 關於大陸學界對於辛亥革命的詳細評介，見張玉法，〈大陸學者對辛亥革命的看法〉，《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25-47。

即使「辛亥革命不是一個失敗的革命，也是一個未完成的革命。」³然而，如果我們換個角度，試著從服飾、髮型、禮儀等身體外在的變化來觀察辛亥革命所帶來的影響與衝擊，就不得不讓我們重新評估辛亥革命的意義。晚清十年間旅居海外與租界的革命黨人，已經普遍地以剪辮一事，做為抒發革命信仰的表現，而在辛亥革命爆發後，庶民百姓更是藉由剪去辮子來傳達支持革命的決心與意志，於是剪辮之舉迅速成為反清革命的最重要象徵。

歷來論述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都將剪辮視為辛亥革命的重大成果，專門探討剪辮行動的相關論文也為數不少。最早談及的論文，是王爾敏〈斷髮易服改元—變法論之象徵旨趣〉，他將剪辮、易服及改曆都視為變法維新的象徵，此後革命派也繼承這樣的觀念，辛亥革命的成功，終於達成剪辮易服的目標。⁴日本學界關於此一主題的最新力作，是吉澤誠一郎的〈清末剪辮論的考察〉，論述的焦點在探討晚清從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維新派人物，到章太炎、鄒容等革命黨人的剪辮言論，並分析這些剪辮言論背後所持的理由根據及論述邏輯，較少觸及一般民眾實際剪辮行為的社會面向。⁵大陸學界方面近年來也有許多探討剪辮易服的專文，舉其要者有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⁶邱巍〈辛亥革命後的剪辮易服潮〉、⁷王奇生〈留學生：剪辮易服的帶頭人〉、⁸張松祥、龔鵬〈剪辮風潮與反清革命〉、⁹李喜所〈辮子問題與辛亥革命〉、¹⁰吳善中、黃蓉〈淺論辛亥革命前夕狂飆突起的剪辮運動〉、¹¹董玉梅〈辛亥首義前後的剪辮運動〉、¹²李樹〈髮式與民族

3 張玉法，〈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意義〉，《辛亥革命史論》，頁22。

4 王爾敏，〈斷髮易服改元—變法論之象徵旨趣〉，《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

5 吉澤誠一郎，〈清末剪辮論的考察〉，《東洋史研究》，第56卷第2期（1997年9月），頁307-341。

6 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渤海學刊》，1995年第3期。

7 邱巍，〈辛亥革命後的剪辮易服潮〉，《史林》，2000年第2期。

8 王奇生，〈留學生：剪辮易服的帶頭人〉，《神州學人》，1995年第7期。

9 張松祥、龔鵬，〈剪辮風潮與反清革命〉，《雲夢學刊》，第23卷第6期（2002年11月）。

10 李喜所，〈辮子問題與辛亥革命〉，《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6期。

11 吳善中、黃蓉，〈淺論辛亥革命前夕狂飆突起的剪辮運動〉，《揚州大學學報》，第6卷第2期（2002年3月）。

12 董玉梅，〈辛亥首義前後的剪辮運動〉，《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心理〉、¹³王冬芳〈剪辮放足與其對中國邁向近代的歷史意義〉。¹⁴上述大陸學者這些以清末民初剪辮運動為論述核心的論文，內容的詳略或有不同，所持的觀點與看法卻大同小異，都將當時人的剪辮動機解釋成是反滿意識的具體表現，於是種族革命就成為剪辮此舉的唯一意涵，這幾乎變成是天經地義的常識，也少有學者提出質疑。

不過，近年來已有一些歷史學者對於清末剪辮行為提出極具新意的看法，林志宏從反對剪辮的一方，即由滿清遺民的角度，來看髮辮所具有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意涵。¹⁵黎志剛將清末的剪辮議題視為晚清國族想像與國族建構的一個環節，討論近代知識分子如何從髮式中去想像未來及變革方案，從對新髮式的倡議過程、髮式，演變成識別革命與政治立場的標記，作者也認為髮型的變遷，反映了民族認同、性別區分及假髮市場需求等社會經濟因素的趨力；黎志剛的研究顯然已經注意到剪辮易服不只是一個政治的行為，也受到社會、經濟與文化層面的拉扯。¹⁶

此外，西方學界也嘗試對剪辮之舉提出新的觀點，最新的兩本力作是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¹⁷他援引人類學的象徵與儀式的觀點，將辛亥革命後的剪辮運動，解釋成是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藉由外表的重整與改造達到塑造新國民的目標。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¹⁸則以「男人形象的民族化」來詮釋辛亥革命後新政府雷厲風行所推動的剪辮行為，強調「對於孫中山等革命派分子而言，通過重新確定中國男性的外在標準形象，使人

13 李樹，〈髮式與民族心理〉，《青島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

14 王冬芳，〈剪辮放足與其對中國邁向近代的歷史意義〉，《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2期。

15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頁81-102。

16 黎志剛，〈想像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髮型問題〉，《思與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關於黎志剛所注意到清末民初剪辮行為也受到假髮市場需求等經濟面向的影響。在此特別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的提醒。

17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8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產生一種全新的民族主義視覺認知，是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條件。」¹⁹

雖然，黎志剛、Henrietta Harrison及Karl Gerth等學者援引西方國族主義的理論，對於清末民初的剪辮之舉，提出不同以往的詮釋，但嚴格說來，他們還是將剪辮視為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一部分，仍是屬於一個表達政治意向、態度及立場的動作。不過，1990年哈佛大學教授孔復禮（Philip A. Kuhn）的《叫魂》（*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一書，卻為我們如何認知剪辮行為，開啟了一頁新窗；該書詳細探討乾隆年間發生在江南地區的巫術剪辮事件—「叫魂案」，這起事件的主角是乞丐和遊方僧，他們都是屬於社會的邊緣人與外來者，傳說他們會呼喚小孩子的名字，以勾攝其魂魄，或是偷偷割取男人的髮辮，然後對著割下來的辮子吟唸咒語來汲取魂魄，這些被剪去辮子之人的魂魄，在巫術的召喚中，被攝取到辮子裏，辮子因此具有了法力，再將這些有法力的辮子綁在紙人、紙馬之上，就可以役使這些人去做各種不法之事。²⁰

孔復禮以官方檔案為主，藉著一連串子虛烏有的「叫魂案」，我們看到中國特有的剪辮巫術如何具體運作，如何成為一般民眾現實生活的一部分，又如何引起他們歇斯底里式的驚恐；作者的企圖心，不僅在於搜奇誌異地描述這個叫魂的巫術，而是從一個看似無關宏旨、光怪陸離的民間迷信，進而探討中國官僚制度中皇帝與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關於中國官僚制度的運作，已經超過本文所要討論的範疇，不過，作者對於剪辮巫術的細緻分析，卻深刻地開拓了我們的視野，重新認識辮子對傳統中國人所具有的文化意涵。

孔復禮對叫魂案的分析提醒我們，看似相同的一個剪辮舉動，其實蘊藏著複雜的動機與意義，以往的研究對於晚清剪辮風潮近乎單調的解釋，反而是過度簡化了剪辮行為背後豐富的歷史意義；然而，長久以來這種既定的看法，並不代表我們仍然只能用反滿革命的單一表述來看待剪辮問題，同樣的剪辮行為，背後可能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動機，而將辮子視為反清的種族革命象徵，充其量可能只是波濤相連的

19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69-70.

20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8-103.

層層巨浪中，那個較高的大浪。

本文希望在過去諸多的研究基礎上，重新耙梳清末民初豐富而多元的政治文化，並擬以這段期間的剪辮風潮做為觀察的切入點。在政治、社會、文化結構變動劇烈的辛亥革命時期，身體外形的變化，雖然無法發出動人心弦的吶喊聲響，卻可能比形諸筆墨的文字，更能洩露出當時人難以明說的欲望、價值與期待，而種種權力的消長，也都要藉由身體的變化來展現。身體更是各方競逐角力的重要戰場，晚清逐漸浮現出來的政治黨派、社會團體及新興階級，對於新國民的身體場域，以及新國民身體的呈現，舉凡髮型、衣著、裝飾、體格和禮儀等，都可能有自成一格的想法，不僅反映其理想中的國民形象，也為一個即將成形的「想像的共同體」，勾勒出一個具體的輪廓、線條與形態。更重要的，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只注意到上層革命派菁英的剪辮訴求，而忽略了歷史其實是由每一個有血有肉的個體所組成，千千萬萬人看似相同的剪辮之舉，內在可能有著南轅北轍的心理動機與個別差異。本文希望藉由表面上看似無奇的剪辮行為，闡釋此舉背後所隱藏的複雜的社會心態，試圖重新為晚清的剪辮行動，添加一些過去被忽略的肌理與血肉。

二、傳統男子髮式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一）先秦儒家文化的解釋

過去在革命史觀的籠罩下，歷來有關晚清剪辮風潮的論述，不論是將辮子視為分疏種族界線的象徵，或是援引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²¹都將剪辮與髮式視為晚清「國族想像」的一部分。對於晚清的剪辮與留辮的兩難抉擇，其實隱藏著不足為外人道的無奈與掙扎，除了反滿革命的意涵外，剪辮對一般民眾來說，還反映著羞恥（通姦的男子都會被剪去辮子）、性無能（頭髮有著性功能強弱的象徵）與失去魂魄等嚴重的後果。

根據孔復禮等學者的觀點，頭髮對於漢族男子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幾點：一、

2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 Verso, 1991) ,pp. 21-25. 安德森認為「國族」並非完全是由語言、種族或宗教等既定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產物，而是透過「想像」始得存在。

儒家經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灌輸，證明儒家的孝道不僅是日常行為的表徵與規範，更是決定個人身體如何呈現的權力來源。二、自先秦以來，藉由服飾、髮型等禮儀文化來區別的民族大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所說的「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這句話並沒有告訴千年以來的讀者，管仲究竟做了什麼，而是以隱喻的方式，說明華夷之別、文野之分，無非是以髮型、服飾的轉變來呈現，這也得見在中國服飾等外在特徵，早已是被高度規範化的符號系統，具有濃厚的文化象徵意義，並埋藏於漢民族的深層意識之中。第三是人類學方面的文化意義。漢族男子小心翼翼地蓄留長髮，不只因為在儒家文化裏，頭髮是士大夫形象與風度的一部分，更在於一頭精心打理的長髮，可說是漢族社會男子氣概與社會地位的具體象徵。²²

漢族成年男子普遍通行的髮型，是將頭髮留得很長，挽髻於頭頂上。《儀禮·士冠禮》中，記載男子在二十歲成年時，要經歷一項結髮戴冠束巾的隆重儀式，而在冠禮儀式結束後，男子的頭髮就成為身分的象徵，終身不敢毀傷。晚明時期初到中國的西洋傳教士，對於漢族男子這種引人注目的髮式印象深刻，傳教士巴克士（Father Martin de Rada）在他的報告中寫道：

明代男子為有滿頭長髮而驕傲，他們把頭髮留得很長，然後在頭頂上盤成髮結，再用一個中間分開的髮網套住，使頭髮被夾住並被固定在這個位置上，在髮髻頂上戴上一頂帽子，這是他們一般最常見的頭飾，而頭頂的帽子是由一種最好的絲線以及金線織成的，每天早晨他們梳理和裝飾自己的頭髮要花去很多時間。²³

雖然，外在身體形象的文明與野蠻意義，對中國人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大節，但這只是儒者才有的觀念，至於一般的庶民百姓，則未必將頭髮視為有如此強烈的種族及文化意義，下層民眾的恐懼在於他們的潛意識裏，頭髮象徵生殖能力。在許多民族的文化裏，都認為頭髮有著特殊的魔力。傳統中國裡也有類似的例子，明末清初當清兵快要打到江南之際，江陰等地人民就有這樣的傳言，有人恐嚇無知的鄉民

22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p. 58.

23 Frederic E.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648.

說：「爾等若剃髮，則不能保妻。」²⁴說明基層民眾最恐懼的，可能是怕喪失頭髮象徵著一併喪失生殖能力，除了人類學的深層文化意義外，和尚等出家人既沒有頭髮也沒有老婆，表現其棄絕凡塵俗世的意圖。因此，清朝入關後的蓄辮令，激起全部漢族男性的群起反抗。顯示上、下階層人士間，對於剪髮雖然都是強烈的反對，但背後的動機與原因卻不盡相同。

（二）滿清入關後的巨變

數千年來不動如山的頭髮，在滿清入關後遭逢前所未有之變局。1644年春，清攝政王多爾袞在進入北京城後，一連發布了數道雷厲風行的剃髮令。²⁵

頭髮既然是對漢人如此的重要，也難怪滿清剪髮令一下，會引起驚人的反彈聲浪了。魯迅早已嘲諷的說：「我們講革命的時候，大談什麼『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實也不過一種手段；老實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嘗因為亡國，只是因為拖辮子。」²⁶雖然這可能誇大了剪辮的反抗意識，不過，根據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對清廷入關史實的研究，的確有許多例子顯示，清初江南地區平定後，卻因為剪辮令，而再次引起地方人士的反抗。孔復禮回顧滿清的征服年代，也認為：

與其呼籲江南人民效忠瀕臨滅亡的明朝政治秩序，不如召喚他們抵制剃光前額的法令，以表現出捍衛漢族文化尊嚴的決心。發生在長江流域的那些聞名於世的抵抗事件，顯示了在民眾的心目中，削髮問題與人的自尊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聯繫。²⁷

在直隸的三河和保定等地陸續爆發了反對剃髮令的民變後，²⁸原本對漢人剃髮態度堅定的多爾袞，也不禁動搖了。1644年6月25日，多爾袞發布弛禁的告示：

24 Frederic E.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 642.

25 多爾袞在擊潰李自成的大順軍後，立即諭令明朝臣民薙髮。《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7年），第5卷，頁1-6。

26 魯迅，〈頭髮的故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卷，頁462。

27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p. 58.

28 Frederic E.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 421.

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²⁹

不過，這場頭髮的戰爭，並未就此止息，僅僅是序曲中的一篇章小節而已。1644年4月八旗勁旅大舉南下，5月20日，堅守七天的揚州城被攻破，面對江南民眾頑強的抵抗行動，此時多爾袞決定採行強制剪辮的高壓政策，再次雷厲風行地下令薙髮，由於漢族男子的強烈反抗，這場剪辮的落幕是以萬千人頭落地而告終。

（三）妖術的作祟：不絕如縷的剪辮恐慌

等到清初的薙髮風暴塵埃落定後，辮子所引起的紛紛擾擾，就轉而是另一個問題。關於割去辮子的流言蜚語，1768年（乾隆32年）一場因剪辮取人魂魄的傳言而引爆集體歇斯底里恐慌的叫魂案件，甚至驚動到乾隆皇帝，藉此整肅效率不彰的官僚體系，幾乎造成整個帝國的動盪不安。乾隆中葉時的叫魂事件驚動全國，這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在孔復禮的專著中有完整的說明，它反映了在一般人的心中，對於這些術士能夠利用人的頭髮來汲取他人的精氣與魂魄，然後再將這些精氣轉移到紙人之上，藉此控制他人的一舉一動，可說是深信不疑。而下層民眾對於失去辮子的恐懼根源，與其說是來自於清廷的「留髮不留頭」的高壓統治，不如說是喪失魂魄的巫術恐慌，還來得較貼切一些。³⁰

而這股叫魂巫術的傳說，並未隨著乾隆統治的結束而就此落幕，此後類似的剪辮風暴，至少還曾在1810年（嘉慶14年）及1876年（光緒2年）出現，同樣引起下層群眾的集體心理恐慌。³¹這顯示了中國人認為毛髮等身體器官，都是有生命的象徵，巫術可以藉由對頭髮或指甲等物，控制人的靈魂；因此，下層社會百姓對頭髮所具有的象徵意義，往往來自於這些小傳統中所流傳的觀念。頭髮既然有如此大的魔力，鄉民因恐懼而產生的心理，就不是沒有道理。不過，直到辛亥革命前夕，剪人

29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第5卷，頁5。

30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pp. 107-115.

31 蘇萍，〈清代妖術恐慌及政府的對策：以兩次剪辮謠言為例〉，《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12月號，頁45-51。

辮子的傳聞依舊不絕如縷，也不得不令人聯想及懷疑，辛亥革命期間，許多下層民眾抗拒剪辮的動作，是否和上述的叫魂巫術有關，恐懼魂魄遭到革命黨人的收服。

1875年，從南京一地開始，迅速流傳著巫術剪辮的謠言，引起東南各省的驚恐，謠言的開端是南京城牆的正南門有一座昔日被太平軍破壞的聯外大橋，此時正在重建，市井之間流傳著建造此橋需要一種特殊的橋樁，必須有一定數量的靈魂支撐橋面石頭的重量，至少需要100名至150名南京城內的男孩魂魄，否則護橋神無法保證木橋的牢固，於是家家戶戶都陷入恐懼之中，害怕自己的孩子被抓走。

這類的剪辮謠言猶如星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江南各地許多鄉村甚至徹夜鳴鑼巡禁，到處搜索可疑之人，前後抓了許多剪辮嫌疑犯。從兩江總督沈葆楨的調查中，他根據安徽巢縣知縣金剛保的報告，認為從被捉拿的嫌犯供詞中得知，這些剪辮之人的目的是要「得生人之辮，分插木頭上，練以符咒，可化為兵，倘恍迷離，肆無忌憚。」沈葆楨大膽的推論，應是秘密教派白蓮教徒所為，雖然他並沒有說明原因。³²

南京的風暴還未結束，這場剪辮巫術更傳到了北京，民間謠傳已經有多名幼童被剪去辮子，三日內必死，社會上人心惶惶。據當時人在北京的傳教士何天爵回憶，剪辮謠言出現後，北京的地方官就曾先後發布告示，而這些告示與其說發揮了消弭人心混亂的效果，不如說是雪上加霜，更增加了人們的騷動不安。在他看來，這些告示的內容，許多都是荒誕不經，除了警告一般民眾，應該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裏，避免被巫術盯上外，這些告示還頗具實用性質，提供民眾破解妖術的處方。例如，將紅色和黃色兩種顏色的絲線與髮辮綁在一起；勸導民眾內服某種克制妖術的藥方；還有一張布告教導民眾把一副藥的一半，吞進肚裏的同時，另一半要撒進廚房的爐火中。何天爵具體提供了一份告示的內容，這是順天府尹所發布的一個處方：將三個漢字所組成的一個圖形，按一定的方式交纏連結地寫在一起，再用墨汁將其形狀寫在三張大小固定、特製的正方形黃裱紙上，然後將其中的一張燒掉。」³³地方官吏主動提供這些符咒供民眾破解妖術的做法，在今日看來實在有些

32 沈葆楨，《沈文肅公政書》（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第4卷，頁67。

33 何天爵著、鞠方安譯，《真正的中國佬》（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頁133-139。

匪夷所思，這證明上層官員與下層民眾、大傳統與小傳統間，都同樣相信這種剪辮巫術的存在。

在1885年的《點石齋畫報》中，也有這種剪辮妖術的記載，警告大家千萬小心這種剪辮紙人的妖術：

「京城哄傳有邪民驅使紙人剪辮一事，近日……某戶於屋後水缸中獲一紙人，身長三寸許，耳目口鼻四肢無一不備，一手持刀、一手持剪，作躍躍欲試狀。」畫報作者的評語說：「（此事）惟剪辮則確鑿有之說者，此術極為靈驗。」³⁴

1908-1909年間，華北各省又瀰漫了一股妖術剪辮的謠言。河南省自從1909年春天以來，一直都是乾旱的季節，忽然傳出有白蓮教剪辮以取人魂魄之事，愚民一唱百和，信以為真。³⁵鎮江也到處出現紙人剪髮辮的邪術。³⁶依舊造成民間社會的騷動與不安。

這些剪辮妖術的歷史記憶，才是一般下層民眾真正的恐懼來源，許多民眾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剪辮與反滿種族革命的關係。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到處剪人辮子，下層民眾的抗拒聲浪不斷，孫家振在《退醒廬筆記》裏提到，他對辛亥革命期間剪辮風潮的看法是：「則是同治年間剪辮之擾，殆為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兆，否則何遙遙相應之巧耶？」³⁷這也顯示民國初年革命黨人競相剪辮之舉，對許多人來說，在他們的記憶裏所聯想到的卻是取人魂魄的妖術。

三、晚清維新派人士對剪辮問題的態度

（一）斷髮易服辯論與中日西學競爭

隨著十九世紀中西接觸的日益頻繁，中國男子的辮子從天朝上國的國民象徵，

34 〈邪教宜治〉，《點石齋畫報》（臺北：天一出版社，1978年重印本），戊二，1885年，日期未註。

35 〈汴省白蓮教之謠傳〉，《大公報》，1909年7月14日，版2。

36 《大公報》，1909年7月20日，版2。

37 孫家振，《退醒廬筆記》（上海：上海書店，1998年），頁37。

逐漸變成被外人嘲笑與譏諷的對象，其間經過一個頗為漫長的轉變過程，其關鍵在於清廷國際地位的消長，尤其是1840年甲午戰爭的慘敗，澈底打碎了中國人的天朝夢。我們可以從以下李鴻章與日本駐華大使森有禮的對談中，看出甲午戰爭前後，中國人對本身文化禮儀自信心的微妙轉變。

1875年（光緒元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北京接見日本新任駐華公使森有禮，兩人對於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的斷髮易服之舉，進行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李鴻章詢問森氏對中西學問的看法，後者答覆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係舊樣，已無用了！」其關於髮服之問答如下：

李：「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沒有。」

李：「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森：「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盡學會。」

李：「對於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讚賞，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簡單，只需稍加解釋，我國舊有的服制，正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適於無事安逸之人，但對於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適，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於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李：「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先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國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採用。不論何事，善於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李：「貴國祖先採用我國服裝是最賢明的，我國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製作，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森：「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良而便利。像貴國頭髮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適應我國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適應。關

於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花費多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源，這也是閣下所知道的。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適應怠慢而不適應勤勞，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致貧，而想要勤勞致富，所以捨舊就新，現在所費，將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捨舊服而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

李：「我國絕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採之外國。」

森：「凡是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³⁸

此時自強運動與明治維新都在起步階段，這場向西方取經的競賽，勝負尚在未定之天，但從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外交會談中，卻能看出雙方對於西學的認識，幾乎是各說各話、難有交集。李長莉解釋李、森二人歧見的癥結點在於：

李鴻章把服式作為「祖制」，將此舉視為「臣服」西方的標誌，而森有禮所代表的日本人的觀念，……只是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待服式，……也反映了當時的日本人重實際，而中國人更重名分的觀念差別。³⁹

在晚清類似李鴻章對日本斷髮易服的鄙視並非特例，《申報》也曾在前一年刊載一篇嘲諷日本改裝之舉的評論文章：

自古聖王有天下，頒正朔、易服式、異器械，所以明一統之尊，而使天下知當王之貴也。未聞王章具在，而數傳之後可以變亂制度者。……日本為東瀛島國，與西國通商，能留心西國之所長而法所當法，是或一道也。乃有兩端焉：一曰用西曆，一曰衣西服。夫日本猶是開創之君所遺之日本也？而胡為一列通商，即改其正朔、易其服式歟？……若日本商

38 〈李鴻章與森有禮問答節略〉一文，分別收錄在以下各書，所用文字略有差異，參見中國史學會編，《中日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冊，頁299；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頁73-74；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卷，頁409-411。

39 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1卷，頁410-411。

於各埠者，均挾重資、有身家，而居然貌似泰西，則未免法西國而失之太過也。豈不如此即不可通商乎？抑中國與日本風俗異而人心亦不同乎？……何期與泰西通商而後遂不知尊王之義乎？……國中先變其所習，則竊爲之不取也。……從西國服式則殊駭人觀，何也？外飾者可假，而生成者難改也。美髮截之短而不能使之拳，鬚髯本黑而不能使之黃，顧盼流媚而不能使之碧翳，山根平坦而不能使之隆準，就令工於學步，亦不過大西洋葡萄牙人耳，豈能如歐羅巴哉！⁴⁰

不過，這些冷嘲熱諷都不及1876年以副使身份出使日本的張斯桂所作的詩，來得辛辣入骨：

椎髻千年本色饒，沐猴底事詫今朝，改裝笑擬皮蒙馬，易服羞同尾續貂。優孟衣冠添話柄，匡廬面目斷根苗，看他摘帽忙行禮，何以從前慣折腰。⁴¹

連對鄰國國內剪髮易服的家務事，晚清的中國人都表現的如此義憤填膺，可見髮服問題在中國人深層的文化意義裏，是多麼的重要了。

（二）維新派的剪辮言論

甲午戰後，國內朝野上下要求改革圖強的聲音如沛然之勢，莫之能禦，如果將晚清人士關於剪辮爭議形形色色的理由與動機，劃上一個座標觀之，最左側是章太炎、鄒容等激進革命黨人，位於中間的是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維新派人士中，對於剪辮有最完整看法的是譚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學》中率先對剪辮一事提出頗為理論性的探討：

故中國士民之不欲變法，良以繁重之習，漸漬於骨髓，不變其至切近之衣冠，終無由聳耳聽聞，決其志慮，而咸與新也。日本之強，則自變衣冠始，可謂知所先務矣。乃若中國，大有不可不亟變者，薙髮而垂髮辮是也。姑無論其出於北狄鄙俗之制，爲生人之大不便；吾試舉古今中外所以處髮之道，聽人之自擇焉。處髮之道凡四：曰「全髮」，中國之古

40 〈論日本改朔易服〉，《申報》，1874年11月13日，版1。

41 張斯桂，〈使東詩錄〉，《甲午以前日本游記五種》（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145。

制也。髮受於天，必有所用之，蓋保護腦氣筋者也。全而不修，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疾則有重垂之累。曰「全薙」，僧制是也。清潔無累，此其所以長也；而其病則無以護腦。曰「半剪」，西制是也。即是以護腦，而又輕其累，是其兩利。曰「半薙」，蒙古、韃靼之制是也。薙處適當大腦，既無以蔽護於前，而長髮垂辮，又適足以重累於後，是得兩害。孰得孰失，奚去奚從，明者自能辨之，無俟煩言而解矣。⁴²

顯然地，譚嗣同在經過嚴謹的比較後，認為西方男子的髮型是最理想的標準。在維新派中，康有為是另一位注意剪辮易服課題的人士，他在戊戌變法時提出「請斷髮易服改元摺」，這是第一次有人將剪辮一事納入廟堂之上討論。康有為的看法是：

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於尚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且今物質修明，尤尚機器，辮髮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為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歐美百數十年前，人皆辮髮也，至近數十年，機器日新，兵事日精，乃盡剪之，今既舉國皆兵，斷髮之俗，萬國家風矣。且垂辮既易污衣，而蓄髮尤增多垢，衣污則觀瞻不美，沐難則衛生非宜，梳刮則費時甚多，若在外國，為外人指笑、兒童牽弄。既緣國弱，尤遭戲侮，斥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⁴³

在此，康有為認為辮子的不合時宜，與革命黨人高舉種族大防的政治含義無涉，反倒是將辮子與機器等量齊觀，認為造成行動不便與妨礙操作機器的辮子，是中國進入工業世界的一大障礙，成為落後與野蠻的象徵，這顯示維新派將中國男子的髮制問題，視為可以公開討論的公共議題。

梁啟超是對蓄髮問題談得最少的一位，卻是維新派中身體力行的第一人。他在戊戌政變失敗後，亡命日本，根據他在1899年3月24日與妻子李蕙仙的家書中說

42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62-363。

43 康有為，〈請斷髮易服改元摺〉，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2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63。

道：「寄來照像一片，衣冠雖異，肝膽不移。」⁴⁴而在1900年，他遊歷夏威夷及澳大利亞時，從照片我們得知，梁已經是西裝革履小分頭的西化外表了，可以確定的是，最遲在1899年底，梁啟超已經剪去辮子。

至於最右側反對剪辮的保守派人物，除了清廷的上層官僚外，廣大民間士紳的態度，更值得我們留意，這裏以晚清一位僻居山西的下層士紳劉大鵬為例，他在看到留學生返國後的印象，都是圍繞在剪辮易服之上。1902年5月28日的日記裏，他記下一位剛從日本留學而歸的學生，「非但改裝洋衣，而且剪其髮辮，殆華人而變為夷者也。」⁴⁵隔年，劉在太谷城內看到另一位留學生，更是讓他難以接受：

世道之變，日甚一日。人皆言城內一生姓孟名嘉林，從英人學已三年矣，業既畢，給舉人。去冬詣上海，欲游日本，因東洋學生之哄遂歸，而服色竟易洋裝。近日歸鄉，人皆目為洋夷，宗族亦待為異類，此華人變為夷者也。⁴⁶

劉大鵬是一個開明的舊派士紳，對西學有一定的認識與興趣，卻對留日學生的剪辮易服，大加撻伐，認為此舉將徹底破壞華夷的界線，將中外之別繫於區區的一根辮子，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不免輕易地將其歸於違反時代潮流的愚昧言論，但劉大鵬對剪辮行為的疑慮，其實牽涉到長久以來儒家文化是透過對禮儀服制的呈現，來定義每個人的身分，如果不能從傳統禮制對形諸於外的身體表徵與行為舉止的控制有所體認，將難以釐清清末支持或抗拒剪辮背後真正的文化意義與道德秩序。

四、晚清海外華人的剪辮行為

（一）剪辮的先驅：華僑與留學生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期間，涉外人員與留學生是少數會面臨到中西服制衝突的當事者。早期的中國使臣、留學生、出國華工及商民常在外國受到嘲笑，許多學生在出國前即剪去辮子，但是在1890年之前，其實中西之間尚沒有太大的衝突，只不

44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頁88。

45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69。

46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149。

過使外人員腦後的辮子常常會引起西人的誤會，由於這些使臣腦後的辮子與類似裙子的長袍，常會被誤認為是女性。例如，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在1868年隨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團至俄國聖彼得堡參觀時，曾被幾個俄國小孩圍住高喊：「快來看中國婦人！快來看中國婦人！」引起街上一陣騷動；張也在日記中抱怨，由於長袍、辮子和沒有鬚鬚的緣故，他經常得要向外國人解釋他的性別。⁴⁷

王韜在1868年初到歐洲遊覽時，當他在倫敦市區阿伯丁街漫步時，遭到一群兒童的尾隨，從沒見過中國服飾的英國孩童，誤以為王韜是一位正在歐洲旅行的東方女子，大聲喊道：「中國太太！中國太太！」事後，王韜自我解嘲道：

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識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鬚眉，蒙以巾幘，誰實辨之？迷離撲朔，擲身滄波，托足異國，不為雄飛，甘為雌伏，以此童言，詎非終身之讖語哉！⁴⁸

有趣的是，在中國象徵男子氣概的辮子到了西方後，卻被誤認成是女性才有的裝束，而這種性別錯置的困擾，在日後還會一再地出現。

雖然有性別難辨的困擾，但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為了方便而剪去辮子的華僑還是少之又少。上述同文館學生張德彝在隨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團前往歐美各國參訪的途中，當他行經美國西岸舊金山時，使團在下榻住所門口，貼上寫有「華人之著西服者不得參見欽差」的告示，不過，張德彝卻認為此舉實為多餘，他在日記裏寫道：「然華人貿易於此之著西服者，百無一人。」⁴⁹張德彝還曾在首府華盛頓見到一名從上海來的華籍傳教士，這名傳教士在美居住七年，不但剪去辮子還穿上西裝，張大聲斥責其「今汝已剪髮異服，則吾不以華人視汝矣！」⁵⁰張德彝的看法，呼應了上述劉大鵬對留學生的反應，顯示他們共同對辮子具有的文化意涵的重視，而對中國士大夫來說，髮型、服制等外在條件才是構成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要素。

最早依違掙扎於辮髮長袍之間，是在中國近代留學史中，扮演開創者的容闓；

47 張德彝，《航海述奇》，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帙，第55冊，頁69。

48 王韜，《淞隱漫錄》，第9卷（臺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71。

49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52。

50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頁66-67。

由於文獻史料的缺乏，已難得知誰才是第一個剪去辮子之人，⁵¹但最初也最有名的剪辮之人則非容閔莫屬。1847年，十九歲的容閔和其他兩位馬禮遜學堂（設於澳門）的同班同學黃勝、黃寬，跟隨美籍老師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前赴新大陸；1850年，容閔進入耶魯大學就讀，四年後，容閔順利取得耶魯大學文學士的學位，並留下一張珍貴的學士照，照片中的容閔穿著西服、打著領結，腦後的辮子已換成西裝頭的模樣。至於容閔是在何時剪去辮子？曾與容閔在校相處多年的Joseph H. Twichell牧師解答了這個疑惑。1878年4月10日，Joseph H. Twichell牧師在耶魯大學的演說中，對容閔在耶魯的表現有著生動的描述：

……容閔終於闖了過來，他蓄著辮子、穿著中國長袍進入大學，但不到一年，就把兩者都割棄了。1854年容閔的畢業是那年畢業典禮上的大事，至少許多人是這麼看的，而有些人來參加畢業典禮是爲了看一看這位中國畢業生。⁵²

頗值玩味的是，容閔自己從未提及剪辮一事，在他的回憶裏也沒有記載留美期間辮子對他所造成的困擾；⁵³尤其1854年容閔束裝返國，此時正是太平天國席卷半壁江山的最高潮，少了一根辮子的他，並沒有遭遇太多的阻難，反倒游刃有餘地來往戰區之間，大發戰爭財，相較於此後幾代留學生的剪辮痛史，容閔幸運得令人難以置信。⁵⁴但是，由其一手創立的留美幼童事業，數十名與容閔有著相似際遇的留美幼童，就沒這麼幸運了。

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30名抵達美國，負責管理他們的是首任「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陳蘭彬及容閔，陳係翰林出身，個性保守且不懂英文，陳蘭彬及

51 在容閔赴美之前的29年，1818年美國康乃迪克州康威爾城「國外布道學校」即有來自廣州的一名王姓學生入學。至於到歐洲唸書的中國人，更可以追溯到在羅馬多年「習格物窮理超性之學，並西國語言文字」的鄭瑪諾（?-1674）。見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年），頁150。

52 引自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頁152。

53 見容閔，《西學東漸記》，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9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頁5。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頁35。

54 據容閔自述，在其返回中國後，最讓家人不習慣的反倒是一對八字形鬚鬚，違反了中國未婚男子不宜蓄鬚的風俗習慣，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頁45。

容閎象徵拉扯其間的兩股力量。陳蘭彬規定幼童必須保留長袍與辮子，由於長袍類似裙子，在美國同學的眼中，幼童的裝束無異女孩，美國同學均哄笑稱他們為「中國女孩」，類似的嘲笑引來不少次打得鼻青臉腫的糾紛，後來幼童決定改穿西裝，將辮子盤在頭上，或藏於頸後衣領中，這是容閎與陳蘭彬意見衝突的開始。容閎瞭解幼童的苦衷，始終表示同情，但陳蘭彬認為脫下象徵中國士大夫的長袍，令人匪夷所思。幼童也想剪去辮子，但陳嚴令禁止。後期確有幾名幼童剪去辮子，均被立刻遣送回國，以示懲罰。⁵⁵

真正比較大規模地進行剪辮行為的是從華僑社會中開始，不過起初的幾個例子，都非出自於當事人自願的強迫行動。1873年5月，舊金山市政府頒布法律，將關在監獄裏華人的辮子一律剪去。⁵⁶1895年後的臺灣，日本政府也曾迫使臺灣民眾集體剪去辮子。⁵⁷

在庚子拳亂之前，海外華人剪辮的風氣尚未普遍，只有在港澳政府機關服務的華籍雇員或極少數留學歐美的華僑學生，才會剪掉辮子。至於大多數人則由於誤認剪辮就非穿洋服不可，因此，不願穿或穿不起洋服的人對剪辮都還有顧慮，當然，最大的顧慮來自於政治上的考量，一旦剪去象徵清朝臣民的辮子後，就無法再回到中國，因為剪辮在清廷的眼中是大逆不道的叛國之罪。

然而，在1900年之後，僑界的氣氛出現微妙地轉變，同年1月，新加坡僑界經過公開討論後，決定不再限制僑居地華人的剪辮行為，對於剪辮易服的選擇，一切聽其自便，新加坡商會成員甚至決定集體剪辮並改穿西服。⁵⁸此後，由於受到革命黨人的鼓吹，僑界革命風氣日盛，開始提倡剪辮的好處，新學堂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大本營，據同盟會員趙連城等人的回憶，在晚清的最後幾年中，澳門培基學堂的學生在接受革命宣傳後，把辮子看成為亡國奴的標誌，先後剪辮的學生占全校師生的一半以上。⁵⁹港澳各地並逐漸出現公開性的剪辮大會，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根據

55 高宗魯，《中國幼童留美史：現代化的初探》（臺北：華欣出版社，1982年），頁37-46。

56 黎志剛，〈想像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髮型問題〉，《思與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頁104。

5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頁247-301。

58 《中國旬報》，第33期（1901年），頁16。

59 趙連城，〈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界參加革命的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307。

《民立報》記載，是由革命黨人謝英伯等人所倡導的「澳門華服剪辮會」，在當時澳門最大的清平大戲院，舉行大規模的群眾剪辮大會，當日實際到會人數約1,000多人，已經剪去辮髮的港澳人士，都穿著西服到會以為示範，會中由許多革命黨人演講，他們慷慨陳詞剪辮易服的迫切，群眾當場剪去辮子的有100多人，這一次大會無異是對清政府統治權威的公開示威。⁶⁰

（二）國外革命黨人的剪辮行動

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即使是在思想光譜中最保守一端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以學習「堅船利礮」為目標的自強運動，的確有太多不足之處。敗在向來被視為東瀛小國的手下，不僅更加喚醒了原本即有意變法圖強之士，康有為在北京發動全國應試士子聯合上書，主張拒和、遷都及練兵，雖因和議已定，難以回天，但「公車上書」結合18省1,300多名舉人以集體請願的方式，試圖影響政策的做法，對於向來嚴禁士大夫結社論政的清廷而言，不啻是對其統治權威的一大挑戰。⁶¹另一方面，自太平天國之後，久蟄的革命火苗也在悄悄點燃；1894年初，孫中山懷抱著在體制內尋求改革的夢想，遠赴天津向李鴻章上書，希望為自強之道所開出的良方「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能夠獲得李鴻章的慧眼青睞，孫中山焦急地期待李鴻章的接見，但他失望了，此行的失敗，終於促使他不再猶豫，從此以後，他唯一的目標就是推翻滿清政府的統治。同年底，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第一個革命團體一興中會，隔年九月重陽節，興中會以會黨為主，在廣州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因事機不密宣告流產，孫中山與陳少白、鄭少良為躲避清廷的通緝，亡命出逃日本橫濱。

孫中山選在華僑馮鏡如（馮自由之父）所開設的文經商店，與譚發等10多名志同道合的華僑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據當時還是個少年的馮自由說道，初次見到孫中山時，他雖然留著辮子，但久未剃頭，前額頭髮長逾寸許，身著中式長衫來到其家中，此般尊容想必讓馮自由印象深刻，即使事隔三十餘年，他還能清晰地描述

60 《民立報》，1910年4月14日，版2。

61 有關戊戌變法的史實與研究，可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當年會面時的情景。⁶²這可能是因為時人皆「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⁶³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前額沒有剃髮，卻還留著辮子的孫中山，的確難入正經人之流。

橫濱分會成立後，孫中山與陳少白於同日剪去辮子、脫去長衫、改穿西裝。不過，做為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在剪辮易服這個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象徵動作上，卻讓人搶先了一步。根據馮自由的說法，其父馮鏡如自咸豐年間即旅居日本，有鑒於「甲午中日構釁，清軍敗績，余父益憤清政不綱，毅然剪除辮髮。時旅日華僑無去辮易服者，有之獨余父一人耳。」⁶⁴如果此一說法屬實的話，那直到甲午戰後，才開始有僑民出於主動意志，拋棄清朝的服制與辮髮。據馮自由的回憶，當時旅居日本的僑民都稱呼剪辮後的孫中山與馮鏡如等人為「無辮仔」，從字面意義推敲，這應該不是太正面的綽號。

1900年後，國內興起一股留學日本的風氣，在這龐大的學生群體中，革命思想隨之散佈開來，在同儕之間的互相影響下，不少留學生前後剪去辮子。寫下《革命軍》的鄒容，應是剪辮的先驅，1902年春天前赴日本時，他在上海登上開往日本的輪船後就把辮子剪掉，並將辮子扔進了大海裏。⁶⁵許壽裳是1902年秋天抵達日本，他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和同班同學韓強士一同剪去了辮子。⁶⁶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在抵達日本前就動了剪辮的念頭，多半是受到日人嘲諷下的刺激，同盟會員景梅九1903年初至日本時，與同校的幾個日本同學用漢字筆談，他們說：「辮子不好看，剪了好，我們稱豚尾。」讓景梅九感到極為難堪，在羞恥心的驅使下，他直奔理髮館打著手勢要剪辮子。⁶⁷

62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頁1-4。

63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魯迅散文選》（臺北：洪範書店，1995年），頁432-433。

64 馮自由，〈自序〉，《革命逸史（初集）》，頁1-2。

65 後來鄒容與章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入獄，章太炎給鄒容的詩說：「鄒容吾小弟，披髮下瀛州，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糍，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兩只頭。」稱讚鄒容的剪辮與革命行動。見瞿君石，《青年之神—鄒容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4年），頁126-128。

66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壽裳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上卷，頁75。

67 景梅九，《罪案》，收入於《辛亥革命資料類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34。

1902年革命黨人吳玉章和兄長及同鄉黃芝一起到日本留學，吳原本崇拜的對象是康梁等維新派，後來逐漸在革命思想的洗禮下，隔年參加了拒俄義勇隊，走上革命的行列。不料同來的黃芝政治立場極為保守，寫信回鄉檢舉吳玉章加入了革命黨，但吳玉章說這「不但未能使我發生恐慌，反而更堅定了我參加革命的意志，我一怒之下，馬上把頭上的辮子剪了，以示永不回頭的決心。」⁶⁸

此外，也不是每個革命黨人都能迅速感受到革命思想的衝擊。張繼1899年底還梳著辮子抵達日本，據他的回憶說，1903年以前的他「尚戴辮髮，對於政治毫無正確認識。」⁶⁹張繼是在1903年剪辮，很明顯是受到同一年所發生的拒俄運動的衝擊，這個事件深深刺激了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投身革命陣營。⁷⁰1903年4月下旬，日本各大報紙刊載俄國向清廷提出七條嚴苛要求，如果不從，俄國將拒絕撤出自庚子拳亂後占領東三省的軍隊。⁷¹留日學生在看到此一消息後，群情激憤，愛國情緒為之沸騰，決議組織「拒俄義勇隊」，電告當時的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其協助義勇隊開赴前線，抵禦強敵。⁷²當留日學生組織義勇隊時，駐日公使蔡鈞即致電兩江總督端方，指學生此舉「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證諸日後的發展，蔡鈞的密報倒非空穴來風、羅織其罪，「拒俄」與「革命」的確只是一線之隔。⁷³未幾，被日本政府勒令解散的義勇軍，其中成員多轉向排滿革命，許多留學生的辮子就是在此時剪去的。

68 吳玉章，《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頁216。

69 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頁224-227。

70 在拒俄運動中剪去辮子的留學生，較知名者包括黃興、陳天華、張繼、陳獨秀、秦毓鎰、章士釗等人。見景梅九，《罪案》，收入於《辛亥革命資料類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34-69。

71 俄國所提七條要求的條文為：一、俄政府遵1902年4月8日條約，撤去東三省軍隊，以土地交還中國，中國當永遠不以東三省土地租借或割讓他國。二、東三省除營口外，中國政府不得開作通商口岸。三、東三省之行政及軍事，不許他國人干涉。四、營口之稅務司當永任俄國人為之，稅關收入當屬華俄道勝銀行管理，營口地方之檢疫事務，統歸稅務司管理。五、自營口至北京之中國電線上，須允俄人添設一線。六、東三省及蒙古各部現在治轄之法，不能更改，倘欲更改，須經俄人承認。七、中國從前所許俄華道勝銀行及其他俄人之特權，以後不可變改。見〈記事〉，《江蘇》，第2期（1903年），頁11。

72 〈留學界紀事〉，《浙江潮》，第4期（1903年），頁7-9。

73 馮自由，〈青年會與拒俄義勇隊〉，《革命逸史（初集）》，頁106-107。

在熱血澎湃、救國心切的剪辮行動中，也有一些不太協調的插曲，在1903年時，發生了一件引起整個留日學界騷動的新聞，事情的起因是日本政府聽從清廷駐日公使蔡鈞的請求，勒令義勇隊解散，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憤怒，剛好此時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與有夫之婦通姦，正好給了這些學生一個發洩怒火的機會，於是由鄒容領頭，與同學翁浩、王孝縝、張繼等五人於入夜後，潛入姚府：「批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懸諸駿河台留學生會館正樑，聞者稱快。」⁷⁴章士釗回憶此事說：「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稍稍發抒割髮代首之恨。」⁷⁵兩人的回憶內容雖然略有出入，姚文甫的辮子被鄒容等人剪去則是不爭的事實，事後姚氏請求日本警方逮捕鄒容等人，鄒容等人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遣返上海。這件事固然是無足輕重的花絮新聞，但鄒容等人惡作劇式的剪去清廷駐日學生監督的辮子，卻洩漏了剪辮行為的曖昧含義，在清代的歷史裏，凡是抓到通姦的姦夫，都會剪去其辮子以示區別，被剪去辮子後的監督姚文甫，意外的集姦夫與革命黨人的身分於一身，鄒容等革命黨人反倒同時扮演了維護善良風俗的八股之士與自謔謔人者。

革命黨人除了以剪辮行動展現革命的決心外，也從學理上多方闡釋剪辮的道理。首先是革命理論家章太炎，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庚子拳亂，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人民唯有自行保種救國為口號，邀請上海名流八十餘人在張園召開「國會」，又名「中國議會」。會中推舉容閔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為總幹事，「國會」宣布其主要宗旨是：一、保全中國自主之權，創造新自立國。二、不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之權。三、請光緒皇帝復辟。章太炎在上海國會中，「憤然剪除辮髮，以示決絕。」⁷⁶章太炎並在同年8月所撰的《馗書一解辮髮》中，從中國正史記載中找尋剪辮的正當理由：

《後漢書·西南夷傳》：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像龍文，衣箸尾。

尾者，其今滿州之辮髮乎？《漢書·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師古曰：編讀曰辮。斯其來遠矣。

支那總髮之俗，四千年亡變更，滿州入，始髻其四周，交髮於項，下及

74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頁45-46。

75 章士釗，〈疏皇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頁229。

76 章太炎，《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上冊，頁274。

髡髻。一二故老，以爲大辱，或祝髮著桑門衣以終。《通典·樂》六：天竺樂，樂工皁絲布，幘頭巾，白練襦，紫綾褲，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據此，是天竺亦有辮髮。其言若今僧衣者，只指朝霞袈裟耳。又今印度人皆幘頭而不辮髮。然則舞時偶一用之，平日則否，故樂工仍不辮髮也。蓋冠簪高髻之飾，既不可復，則寧盡毀之以章吾志，其情隱矣。其後習夷俗久，彫鬢垂鬣，以爲當然，亡所怪愕。日本人至，始大笑悼之；歐羅巴諸國來互市者，復蚩鄙百端，擬以猓豚，舊耻復振。然士人多要幸儋石之祿，猶前卻持兩可，未盡芟蕘也。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時滿州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橫挑強鄰，戮使略賈，四維交攻，憤東胡之無狀，漢族之不得職，隕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猶被戎狄之服，不違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將荐紳束髮，以復近古，日既不給，衣又不可得。於是曰：昔祈班孫、釋隱玄，皆以明氏遺老，斷髮以歿。《春秋·穀梁傳》曰：吳祝髮。《漢書·嚴助傳》曰：越斷髮。晉灼曰：斷，張揖以爲古剪字也。余故吳、越間民，去之，亦猶行古之道也。會執友以歐羅巴衣笠至，乃急斷髮易服。歐羅巴者，在漢則近大秦，與天毒同抵，其衣雖迥小，方袷直下，猶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輔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蓋與著桑門衣無異趣云。《傳》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萌芽，令他日得端委以治《周禮》，固余之志也。昔者，《小雅》詩人，閔宗周危亂，發憤而作，始之以流水之朝宗於海，而終之以邦人諸友誰無父母。嗚呼！余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億不盈一，欽念哉！⁷⁷

與此同時，留日革命黨人也在報刊輿論上，一再撰文宣揚剪辮易服的必要。刊載於《湖北學生界》第三期的〈剪辮易服說〉，這篇文章仿效漢代〈鹽鐵論〉的問答形式，設計甲乙丙三人以問答的形式，討論剪辮易服的必要性。本文一開頭就

77 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48-149。

說：「今日之中國，誠欲變法自強，其必自剪辮易服始矣。」強調剪辮易服與革命圖強的關係至為密切：「法無論古今，以宜時不宜時為斷，制無問中外，以便民不便民為斷。今之辮服，牽制行動，妨礙操作，游歷他邦，則都市騰笑。……於時為不宜，於民為不便，應當剪而易之。」作者最後提出剪辮易服的八項好處：一、有利於變法：「昔日變法論下，奉行者咸遲疑於朝廷意旨未定，觀望不前，敷衍塞責，若令剪辮易服，革故鼎新，咸曉然於朝廷銳意變法，堅確不移，凡百新政自無不實力奉行。」二、可以養廉，剪辮易服後可以簡化服章，化奢為簡，化貪為廉，減少等級差別。三、可以強兵，清末新軍已經一律改為西式裝備，「唯辮髮尚存，終嫌拖邐，去此累贅，則策馬駛船，轉運矯捷。」四、便於提倡體育鍛鍊，強壯民族體質。五、便於行動勞作。六、可以振興工業，除去不便於行動的褒衣博帶，行動自然敏捷，便於從事勞動工作。七、可以改善外交，剪去辮子後改服西裝，便於接觸外人「洞矚西情」。八、可以消弭教案，改善仇洋仇教心理。最後作者強調剪辮易服已經是「天下大勢所趨，……所謂變亦變、不變亦變也。與其變自人而徒受異族之欺凌，奚若變自己而先振自強之氣象！」⁷⁸該文並沒有觸及清廷最在意的革命思想與種族問題，而是以便利、文明、科學的理由，反覆闡述剪辮易服之必要，在思想論證上已極為縝密。

同年於東京出版的《黃帝魂》一書，這是一本宣傳革命思想的言論刊物，其中有一篇〈論髮辮原由〉，一開頭就說廣西民黨剪辮者已至18,000人之眾，東南亞華僑也相繼剪去辮子，這當然是誇張之詞，作者論述了當時的世界潮流，指辮髮是一種屈辱與累贅，必須盡快革除，並歷數拖著辮子的中國人在海外的艱苦：「凡我國人所到之處，就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拖尾奴才之稱，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槍轟斃之，含冤茹苦，無可告訴。」如以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外形加以比較，則中國人的辮髮實最為醜陋：「頭剃其半，背曳以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矣，何況外人。」作者重申變法維新的第一要務，首先在改變裝束，而將戊戌變法的失敗也歸諸於此：「戊戌推翻新政，一蹶不振，論者多咎變法之初不先變髮。……面目形狀既變，衣服裝束不得不隨之而變，衣服裝束變，則行為政治不得

78 〈剪辮易服說〉，《湖北學生界》，第3期（1903年3月），未註明頁數。

變矣。惜乎未能先事於斯，遂令一往無餘也。蓋欲除滿清之藩籬，必須先去滿洲之形狀，舉此累贅惡濁煩惱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後彼之政治乃可得而盡革也。」相較於發表於《湖北學生界》〈剪辮易服說〉，這篇〈論髮辮原由〉明顯地帶有濃厚的種族革命意涵，作者認為剪辮乃是革除滿清苛政的首要步驟，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對於剪辮後所勾勒的藍圖，他主張未來的新國民不需要再恢復傳統漢族的古制「束髮挽髻、寬衣博帶」，徒增各種不便，而是建議全面改易西裝，使中外服飾趨於大同。肯定西裝的精神「在於發奮踔厲，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性根。」⁷⁹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它反映了革命黨人看待剪辮易服的基本立場，一方面將剪辮視為排滿革命的象徵，另一方面將剪辮易服看做是朝向文明國家一員的具體做法，證諸辛亥革命後的發展，也和該文的主張頗多吻合之處。

在海外的革命黨人藉著可以自由討論剪辮易服的言論空間，反覆重申辮子給中國人所帶來的屈辱，1903年從日本返回上海的鄒容，發憤寫下晚清最風行的革命宣傳品—《革命軍》一書，在「革命之理由」一章中，深刻地批判了辮髮之罪，鄒容說：

拖辮髮，著胡服，蹣跚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 tail（譯言豬尾），或Savage（即野蠻）何為哉？又蹣跚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拖尾奴才。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⁸⁰

從這些呼喊剪辮的革命言論中，革命黨人所一再強調的辮髮之恥，其實是新恥（外國人的鄙視）喚醒了舊恥（滿清的異族統治），而清末革命的宣傳過程，也就是在這種「身體之恥」的心理因素下累積成巨大的反滿能量。除了激昂澎湃的革命激情外，在海外特別是東京的革命黨人，盡情的以文字宣揚剪辮易服的必要性，以及剪辮與革命的關連，他們前仆後繼地剪去辮子，藉此傳達個人勇往直前的革命信念。不過，以下我們將會從魯迅的剪辮經驗與辮子情結裏，不經意地看到在澎湃激昂的反滿情緒之外，掩藏在剪辮行動背後的複雜動機，而晚清十年國內的剪辮易服風潮，其實就是由這些諸多政治社會環境與心理因素所共同交織而成。

79 〈論髮辮原由〉，《黃帝魂》，頁25-27。

80 鄒容，〈革命軍〉，《鄒容、陳天華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4。

（三）從魯迅的個案來看剪辮的複雜意涵

在數以萬計的留日革命黨人中，日後的新文學大師魯迅也是熱烈響應剪辮號召的一員。但從魯迅的身上，我們如果仔細的觀察，卻可發覺剪辮此舉的意義裂縫，並可藉此看出剪辮易服實不只是反清的單一意義，而是許許多多隱藏其後的心理動機所共同促成的。在魯迅的小說〈頭髮的故事〉裏說道：「老兄，你可知道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古今來多少人在這上頭吃些毫無價值的苦呵！」⁸¹我們也不應忘記，周作人說魯迅之所以會用阿Q這個名字，可能也是代表一個人的背影加上一條辮子。⁸²這是魯迅的感慨，魯迅自己也有切膚之痛，他剪辮回國後飽受各種責難與嘲諷。

1902年4月，剛滿二十一歲的魯迅由江南督練公所派赴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初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不免都深受辮子的困擾，魯迅的剪辮是在他到達日本的一年後，之所以選在這個時間剪去辮子，絕非偶然。然而，在拒俄運動風潮中剪去辮子的魯迅，日後他一再的「追憶」與「補遺」裏，⁸³從來不曾承認他的剪辮與反滿的種族象徵有任何直接的關係：「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⁸⁴在死前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裏，依舊堅稱：「毫不含有革命性，歸根結蒂，只為了不便：一不便於脫帽，二不便於體操，三盤在凶門上，令人很氣悶。」⁸⁵而在〈頭髮的故事〉這篇散文式的

81 魯迅，〈頭髮的故事〉，《吶喊》（臺北：谷風出版社，1975年），頁41。

82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17。

83 關於魯迅對剪辮一事的「追憶」與「補遺」，張小虹對此文字書寫背後的心理分析，有極為精闢的見解：「『補遺』像是一種補漏洞，一說再說，每次說都說不完全，下回還得重複說。『補遺』像是一種『強制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說，忘記自己早已說過。如果『剪辮』是近現代中國男人身體上的重要『創傷表面』，那魯迅的『剪辮』創傷不僅在於他自己因『這不痛不癢的頭髮而喫苦，受難，滅亡』的親身經歷慘痛鋪陳，更在於創傷變成一種『形式』，一種『內容』之外一說再說的反覆『形式』。『剪辮』——刀剪去腦後長長垂下的辮髮——好似造成一種填補不了的『置缺』（the lack），需要反覆補遺，一種無法癒合的『傷口』（the cut）需要反覆舔舐，而此『置缺』與『傷口』既屬於視覺與身體官能，也屬於心理與創傷記憶。」見張小虹，〈魯迅的頭髮〉，《聯合文學》，2002年4月號，頁90-91。

84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且介亭雜文》，《魯迅作品全集》（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0年），頁240。

85 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雜文末編》，《魯迅文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冊，頁478。

小說裏，魯迅也借N先生的口，談其剪辮「這並沒有別的奧妙，只為它太不便當罷了。」⁸⁶不過，正如有論者懷疑魯迅的動機「越是強調沒有奧妙，越是強調不具革命性，不就越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而引人疑竇嗎？」⁸⁷

尤其，從魯迅剪辮後的一些舉動來看，他的「逞一刀之快」似乎不像他所說的那麼簡單，只是圖個方便罷了。據魯迅的同窗摯友許壽裳回憶，⁸⁸魯迅在剪辮後鄭重其事地到東京的照相館去拍了一張照片，並在照片上題了一首七言絕句，相贈許壽裳，詩云：

靈臺無許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⁸⁹

如果這首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應魯迅剪辮時的心境，那「我以我血薦軒轅」中「血」的意象，足以充分展現此時的魯迅踔厲奮發、意氣昂揚的澎湃熱情，少年魯迅之所以選擇黃帝（軒轅）作為寄託國族感懷與呼喚國族認同的象徵，其實毫不稀奇，黃帝是晚清革命黨人在進行中國國族的建構時，從遠古的傳說中，所共同尋覓出來的神話人物，奉之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從辛亥革命前十餘年間，輿論界與報刊雜誌大量湧現有關黃帝的各類論述，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訴諸於同血緣、同始祖的黃帝神話，才是最主要凝聚近代中國國族認同與排滿革命意識的共同文化符號。⁹⁰

這首小詩不經意地洩漏了魯迅的剪辮與他始終不願直接面對的反滿革命意識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⁹¹相較於其他留日學生及革命黨人對剪辮易服一事所象徵高度政治意義的熱情謳歌、直言不諱，魯迅的欲言又止、欲掩彌彰，更顯得不合時宜、另有文章。雖然有形的辮子已和魯迅身首異處，但無形的辮子卻陰魂不散的纏

86 魯迅，〈頭髮的故事〉，《吶喊》，《魯迅文集》，第1冊，頁72。

87 張小虹，〈魯迅的頭髮〉，《聯合文學》，2002年4月號，頁91。

88 許壽裳回憶魯迅在剪辮的當天晚上：「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著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歷久如新。」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壽裳文集》，上卷，頁75。

89 魯迅，〈自題小像〉，《集外集拾遺·附錄》，《魯迅文集》，第2冊，頁485。

90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頁8。

91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頁29-31。

繞著魯迅的身體表面與書寫文本，至死不休。⁹²難怪有評論家說，魯迅對辮子的耿耿於懷，彷彿果戈里之對於自己的鼻子。⁹³

魯迅一再否認他的剪辮與排滿革命的關連，最直接也是研究者最容易聯想到的原因，當然是辛亥革命後的種種亂象，使得他對革命的期待產生幻滅，這種深沈的失落感在〈阿Q正傳〉裏得到充滿的體現：「未莊的人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一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⁹⁴〈阿Q正傳〉徹底暴露出辛亥革命的虛妄本質，對未莊的人來說，他們所能想到的革命行為只有兩件事：代表士紳階層的趙秀才和錢洋鬼子相約去尼姑庵大鬧一場，打碎了一面「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還順手牽羊偷走了觀音座前的宣德爐；至於一般民眾則是陸陸續續把辮子盤在頭上，採取進可攻退可守的觀望態度。對此，論者的解釋是：「傳統社會的諸多面相並沒有被革命的怒潮沖刷蝕毀，而依然生動鮮活地體現在魯迅筆下一個個卑微、平凡的人物身上。『……對魯迅來說，革命只是將舊的事物、現象換上新的名詞和包裝。傳統社會的積弊、蒙昧和黑暗並沒有因為革命而有什麼變化。』」⁹⁵

另外一篇〈頭髮的故事〉，可說是極不起眼的一篇，與其說是短篇小說，倒更像是回憶錄或散文筆記的體裁；故事主角分別是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和脾氣乖張的N先生，後者是晚清的留日學生，為了方便的緣故剪去辮子，卻在回國後遭人白眼、處處碰壁，雖然從善如流買了一條假辮子，卻還是難逃「假洋鬼子」的嘲諷，而在這個貌似前衛、實則保守的N先生眼中，從滿清入關、洪楊之亂到辛亥革命的場場變局，無非都是一條辮子在作怪。⁹⁶根據魯迅的說法，辛亥革命不過是剪去辮子罷了。

92 張小虹，〈魯迅的頭髮〉，《聯合文學》，2002年4月號，頁90。

93 莊信正，〈阿Q的辮子〉，《阿Q正傳》（臺北：海風出版社，1999年），頁269。

94 魯迅，〈阿Q正傳〉，《魯迅文集》，第1冊，頁247-248。

95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頁3-4。

96 N先生說：「頭髮是我們中國人的寶貝和冤家，古今來多少人在這上頭吃些毫無價值的苦呵！」「我們講革命的時候，大談什麼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實也不過一種手段；老實說，那時中國人的反抗，何嘗因為亡國，只是因為拖辮子。」見魯迅，〈頭髮的故事〉，《吶喊》，《魯迅文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卷，頁72。

尤其，盤根錯節於魯迅內心的幽暗意識，都讓他對任何看似光明的口號與行動感到遲疑，正如他那知名的鐵屋子的比喻，魯迅註定都要以與庸眾對立的孤獨者形象，嶮嶮獨行。魯迅是江南班中剪辮的第一人，他本可以革命先鋒自居，卻於1909年學成返國後，首先在上海裝了一條假辮子，這是清末無辮留學生歸國後的變通之計，由於擔心不小心穿幫後的麻煩，裝了一個月後，魯迅決定還是以真面目示人，不料此舉卻讓他「受盡痛苦，深惡而痛絕之。」⁹⁷據魯迅自承：「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只以為訪友作客的，才有待遇，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麼；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麼受苦。」⁹⁸

受盡無辮的困擾後，魯迅在紹興學堂做學監時，對學生中間興起的剪辮風潮大加勸阻，當學生質問他時，魯迅的回答是：沒有辮子比較好，但我勸你們不要剪，結果學生給他一個「言行不一」的評語，魯迅的回應是「他們卻不知道他們一剪辮子，價值就會集中在腦袋上。」魯迅認為如果剪辮可以與反滿革命劃上等號，那革命也未免太過廉價，而他是絕不相信有如此容易的事情。

在東京和上海，剪辮象徵著前進的新派，但在保守內地的杭州及紹興，就變成是奸夫或假洋鬼子的同義詞。從魯迅一生中對辮子所流露的矛盾情結，不只反映他作品與人格的幽暗意識，也有助於我們重新評估剪辮在清末民初時期所蘊含複雜的種族與文化意義。

五、辛亥革命期間國內的剪辮言論及行動

（一）晚清言論界對剪辮的討論

義和團事件所帶來的滔天巨禍，幾乎造成國之將亡的危機，北京被聯軍占領，

97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許壽裳文集》，上卷，頁88。〈回憶魯迅〉，《許壽裳文集》，上卷，頁185。

98 魯迅，〈病後雜談之餘〉，《且介亭雜文》，收入於《魯迅作品全集》，頁240。

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倉皇出逃西安，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連最後一點紙老虎的外皮，都被狠狠地踹在腳下；1901年1月29日，光緒帝頒布改弦易轍的上諭，針砭中國積弱不振的弊病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經過三十多年自強運動所引進的西學，不得不承認，不過僅學到了些「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⁹⁹

變法之旨既下，朝臣及各地督撫條陳新政的奏摺如雪片般飛來，其中最重要的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奏的變法三摺，第一摺重在人才之培育，主張設立各類新式學堂、改革科舉、獎勵留學；第二摺論新政之基本精神在治、富、強三原則，並列舉改革舊制的十二條辦法；第三摺臚列採行西法的十一項具體做法，包括廣派大臣遊歷海外、全面改行西方軍事訓練方式、充實軍備、獎勵工商投資、制定礦律及商律、改革刑律、推動郵政、採行印花稅、廣譯西書等。¹⁰⁰距離百日維新不過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張之洞等地方重臣面對變法的態度，幾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顯然與庚子拳亂的強烈刺激脫不了干係。¹⁰¹出使德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曾十分生動的形容1901年後朝野上下是如何瀰漫著一股如飢似渴、求新求變的激進氣氛：「光緒初年，故侍郎郭嵩燾嘗言西法，人所駭怪，知為中國所固有則無可驚疑。今則不然，告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漢唐宋明賢君哲相之治，則皆以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憲頌詞，至有四千年史掃空之語。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崙、華盛頓所創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後得者，則心悅誠服，以為當

99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年），第7冊，第476卷，頁9。

100 朱壽朋纂修，《十二朝東華錄—光緒朝》（臺北：大東書局，1968年），第8冊，頁4709-4753。

101 根據蘇雲峰的研究，1901年是張之洞思想最激進的時期，和前幾年相比，簡直判若二人，他甚至在庚子事變後曾致電劉坤一等八人，主張「西方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提出一種地方紳民以選舉方式，選出州縣長官的官員民選制度。見蘇雲峰，〈張之洞的中國官僚系統民主化構想—對張之洞的再認識〉，《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1989年9月），頁181-183。

行。前後二十餘年，風氣之殊如此！」¹⁰²

在新政的推行過程中，販夫走卒及市井小民的反應如何？他們是如何理解新政？新政對一般人又有何影響？如同前述李鴻章與森有禮對剪辮易服與變法關係的討論，剪辮易服的謠言成為下層民眾對新政的第一個印象。從1903年起，隨著新政措施的展開，首先是在江蘇，隨即擴散至華中各省，繪聲繪影地散播清廷即將下令剪辮易服的傳言，雖然事後證明是以訛傳訛、空穴來風，但這股謠言的勢頭來得又急又猛，起因是同年11月清廷在政務處的奏請下，宣布各地水師陸軍官兵及工業礦務學堂學生，為方便實習起見，准許改採西式操服或制服。¹⁰³但命令從中央傳到地方後卻變了調，經過鄉里市井的加油添醋後，剪辮易服的傳言不脛而走，流傳在民間的耳語變成一般百姓也得跟著改穿洋服，甚至效法日本斷髮去辮，一時之間「各報爭相記載，厥後茶樓、酒肆、妓館、煙寮娓娓而談。」¹⁰⁴面對可能會失去辮子的恐懼，社會上瀰漫著一股惶惶不安的氣氛。

在上海道臺袁樹勛及江蘇巡撫端方先後發布告示的澄清下，這場剪辮流言來得快、去得也快。¹⁰⁵但晚清十年關於剪辮的傳言，並沒有隨著謠傳的散去而中止，它最大的意義在於形成一個類似公共空間的討論議題，對清廷而言，剪辮是效忠政權的最重要象徵，在盛清兩百年的時間裏，這是政治的禁區，不容打一絲折扣的；當在海外的革命黨人競相以剪辮易服的行動，表達種族革命的決心時，國內報刊輿論界也對此展開一場熱烈的討論，原本不論是視為祖制或效忠的象徵，剪辮都是毫無討論空間的國家禮制，卻因為新政的推行而變成可討論的選項。於是，剪辮不僅是一翻兩瞪眼的反清之舉，更是可資辯論的公共議題。這顯示晚清十年裏，特別是在清廷鞭長莫及的租界，的確形成了一個相對不受政治力干擾的言論場域，這個言論空間不只可以自由地討論政治問題，也是散布謠言、耳語與是非的集散場域。

首先論述剪辮一事的是上海《申報》、《新聞報》及天津《大公報》，《申

102 〈出使德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奏考察憲政謹擬辦法宗旨摺〉，《政治官報》，第37期（1907年10月26日），頁9-10。

103 朱壽朋纂修，《十二朝東華錄—光緒朝》，第9冊，頁4954。

104 〈釋謠〉，《申報》，1904年10月3日，版1。

105 《申報》，1903年8月8日，版1。

報》在1902至1904年間，登載多篇未署名作者的有關剪辮易服的「社論」，1903年1月19日《申報》刊登《易服色辨》一文，強調變法的要旨在於：

變法必先變人心，誠能使朝野上下間，去其奸詐之心、滌其貪婪之心、化其偏私之心、祛其迂謬之心，然而振作其奮往之心、鼓舞其忠愛之心、堅持其歷久不敝之心，則守舊固足以圖存，維新更易於興國。……

服色變，則人心必隨之而變。¹⁰⁶

從「服色變，則人心必隨之而變」這句話可以看出該文作者仍然認為外在的髮式服裝與內在人心思想，有著密切的對應關係。而在另一篇題名為〈釋謠〉的社論中，一再為風傳不已的剪辮之說來闢謠，《申報》除了再三地強調清廷絕無剪辮易服的可能性，更表露對於剪辮易服的憂心。由於1900年後，各地已經陸續出現許多剪辮易服的年輕人，《申報》對於這樣的現象曾有生動的描寫：

今之斷髮改裝者，亦不少矣，彼少年子弟在各學堂肄業者，大抵去其髮辮仿效洋裝、草帽、革靴、短衣、窄袖，終日街頭蹀躞，三五成群，見神像則毀之，曰此土木偶人也。遇官長則詈之，曰此特尸居餘氣也。……趾高氣揚，不知天地為何物。……其宗旨則口口聲聲革命也，易姓也，自由也，平權也，忘卻天高地厚之恩，輒思作亂犯上之事。噫，斷髮改裝之收效若此！¹⁰⁷

這篇文章將庚子後的許多社會亂象歸諸於這些剪辮易服人士的胡作非為，不難看出《申報》在此時的保守立場。在同時間的另一篇社論裏，作者也感慨「今日甫萌一線新機，奈何被浮躁少年任情破壞！」認為這些剪辮易服的新派人士，「以短髮易服為得計，謂拜跪揖讓之禮無足效，轉以握手脫帽為趨時。……惟易服色、改儀文、馴至慕自由、恥服從矣！馴至講平權，滅倫紀矣。」¹⁰⁸於是，剪辮易服變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連鎖反應，一旦辮髮服飾的禮儀鬆動，社會風氣也會跟著敗壞。「服色變，則人心必隨之而變。」依然是這些保守之士深信不疑的象徵。

相較於《申報》對剪辮易服一事的負面報導，天津《大公報》明顯然站在較開

106 〈易服色辨〉，《申報》，1903年1月19日，版1。

107 〈釋謠〉，《申報》，1904年10月3日，版1。

108 〈阻遏新機戒〉，《申報》，1904年10月13日，版1。

放的立場，從1902年創刊後，天津《大公報》率先採用白話附刊來啟迪民智，而在報導剪辮易服一事上，天津《大公報》採取一種公開徵文比賽的創舉，提供各界一個自由討論剪辮易服正反意見的言論空間。《大公報》曾在1903年及1906年兩次舉行「剪辮易服說」的徵文比賽，在徵文廣告中，即指出舉辦這項比賽的動機在廣泛製造輿情，使清廷知道人心的歸向。在第一次的徵文比賽中，經過兩個月的收件時間，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共收到多少篇投稿，但從公布的入選名單中，卻能觀察出一個新時代的風氣，由於允許使用筆名投稿，除了正取第一名是用本名投稿外，其他錄取者分別有「愛國生」、「中國唯一少年」、「天擇少年」、「平等子」、「江南杞憂生」、「羅蘭夫人後身」、「浙江愛新主人」等，從這些看似突兀的筆名裏，彷彿一個求新求變的時代也於焉到來。

1903年的徵文比賽中，《大公報》只刊載了第一名愛群社署名劍蓉軒主人的朱志父的文章，該文是以一問一答的形式表現，首先問以變法有精神及形質兩方面，斤斤計較於剪辮易服等表面的枝微末節，是否有見樹不見林的疑慮？作者答覆說：

形質者，精神之代表也，形質具而後精神寓焉，……人被褻服則生狎邪之思想，人著禮服則生嚴肅之思想。形質之與精神有密切之關係，自然之理，無可疑者。今當變政伊始，頑固者多疑惡之心，若易西裝庶漸改良其腦筋，而共圖文明之進步。¹⁰⁹

作者歸納出反對剪辮易服一方的理由為好大主義、好古主義、尊祖主義、防弊主義，分別予以批駁及說明。最後大聲疾呼道出：「吾為吾四萬萬同胞忠告，其速剪而辮、易而服，孕偉大之體魄，奮尚武之精神。」¹¹⁰1906年第二次的徵文比賽中，就有比較清楚的報導，總計有36篇來稿，分一、二、三等，共錄取12篇。透過晚清勃興的報刊媒體，自由地討論剪辮易服這樣原本屬於禁區的課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晚清的確已經形成一個相對不受政治干擾的言論空間。

（二）辛亥革命時期的剪辮風潮

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勢力迅速席捲南方各省，1912年1月1日孫中山正式就任

109 朱志父，〈剪辮易服說〉，《大公報》，1903年3月15日，版1。

110 朱志父，〈剪辮易服說〉，《大公報》，1903年3月15日，版1。

臨時大總統，孫立即頒布象徵革命的剪辮令：

滿虜竊國，易於冠裳，強行編髮之制，悉從腥羶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緇流，以終餘年，騰笑五洲，恬不爲怪。矧茲縷縷，易革霉菌，足滋疾癘之媒，殊爲傷生之具。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茲查通都大邑，剪辮者已多，至偏鄉僻壤，留辮者亦復不少。仰內務部通行各省都督，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淨盡，有不遵者，違反論。該地方官毋稍容隱，致於國犯，又查各地人民有已去辮尚剃其四周者，殊屬不合，仰該部一並諭禁，以除虜俗，而壯觀瞻。¹¹¹

在各省先後光復的過程中，剪辮都是各省軍政府第一步雷厲風行的革命手段，光復各省也陸續發布勸導剪辮的告示，首舉義旗的湖北軍政府在10月12日發布的〈宣布滿洲政府罪狀檄〉中，首先強調剪辮的重要性，軍政府還將新軍士兵與學堂學生組成宣講團，到大街小巷宣講，各城門口和重要街道都有士兵把守，還留著辮子的人不得通行。軍政府還設立了剪辮隊，任務就是到處剪人辮子。¹¹²當時在武漢的胡祖舜記述當時的情形說：「剪髮一事，最爲重視，無論何色人等，皆須遵守。其時城門通衢，多有持剪刀執行剪髮之任務者。余憶首義數日後，襄陽人鄭某自湘回鄂，首垂豚尾，被人察覺，目爲漢奸，幾至用武，經人勸解乃罷。」¹¹³可見剪辮在革命的過程中，的確扮演重要的辨別敵我的象徵，也是確認革命成功與否的指標行為。

許多地方在光復後都發起剪髮大會，如鎮江在城外新街開剪髮大會，主持人張金門、吳雲亭演講說「凡我同胞亟宜與會，實行改革主義，惟剪髮之後，現在可無須易服，俟民國國貨實業發達後，再提議實行。」¹¹⁴經過蘇州的浙江民軍強迫路人剪辮，當街被剪辮的鄉人估計至少有六、七百人。¹¹⁵甚至民軍的強迫剪辮舉動，還

11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2。

112 湖北社會科學院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92。

113 湖北社會科學院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頁125-136。

114 《民立報》，1911年12月16日，版1。

115 《民立報》，1912年1月1日，版1。

剪到了孩童和女子的辮子上，這當然是少數革命軍人的過當舉動，不過在剪辮的熱潮當下，也還是有北方的輿論發出不同的呼聲：「身體自由，乃個人神聖不可侵犯之大權，況又係父母之遺體，剪與不剪，各有專司，外人安得加以強權也？」¹¹⁶認為剪辮一事應該是每一個國民的自由選擇，不宜使用強制的手段。

南方各省風起雲湧的剪辮大會，其實還提供了一個讓下層民眾參與共和事務的公開場合，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些剪辮大會已經具有公共空間的雛形。輿論也生動地形容當時的剪辮現象是：「昔日剪辮人，呼為外國人，今日不剪辮人，呼為奴隸，可見中國人進步之速！」¹¹⁷要成為一個共和國民的標準，竟仍是以身體的外觀與辮子的有無來判別，所以當有人建議以去辮與否，作為是否擁有選舉權的依據時，也就不足為奇了。¹¹⁸

不過，並非所有的地方都對剪辮表達歡迎的立場，像是四川成都就頗為保守，一般民眾極為恐懼，甚至有許多無知鄉民將剪髮看做是洋化（從洋）的表現，大為反彈，逼得成都軍政府不得不公布告示以安撫人心，強調剪髮是世界大同與文明所趨，並非是崇洋媚外之舉。¹¹⁹山東齊河縣的通告則是告訴鄉民「觀於演戲，可以猛悟，照得三代以及前明，均係握髮戴冠。」而鄉民最擔心的是違背儒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訓示，這份告示則解釋說：「剪髮非剃髮可比，如願前後統留一律剪短，是於剪髮之中猶寓蓄髮之意，對於漢制、新制兩不相妨。」¹²⁰從這些地方政府的告示中可以看出，內陸民眾對於剪辮的革命意識與種族概念其實是非常模糊的。

雖然剪辮風潮極盛，但是堅決抵制者也不少，尤其沿海與內陸之間存在許多差異，沿海各地由於革命風氣已開，反對剪辮的聲音已是少數，內陸地方士紳雖然不欲留辮，卻也不想要剪短頭髮以仿效洋人的裝束。在湖南長沙，宗社黨人頭盤推髻為暗號。一般鄉人「輒以剪髮為學洋，不肯剃除，乃挽螺髻於頂。」¹²¹甚至還曾在

116 〈論革命元首之責任〉，《大公報》，1912年1月18日，版2。

117 《民立報》，1911年12月28日，版1。

118 《民立報》，1911年12月25日，版1。《時報》，1911年12月28日，版2。

119 《申報》，1911年12月4日，版1。

120 〈齊河縣剪辮之通告〉，《大公報》，1912年5月22日，版1。

121 《民立報》，1912年6月2日，版2。

山東等地出現因為革命軍強迫剪辮所引發的罷市風潮。¹²²

辛亥革命爆發後，在清廷控制力最嚴的北京城裏，漢人官員梁士詒、周自齊發起各部會人員一律剪髮，希望能夠一新氣象，但仍有滿人紹英、達壽極力反對。¹²³根據《時報》的觀察，雖有不少漢人在北方宣傳剪辮，但華北各省的剪辮風氣一直都很冷淡，《時報》的推論是：

要想做官的，不肯剪辮；要想做鄉紳、聯絡官場的，不肯剪辮；要學假斯文、充名士的，不肯剪辮；要學時髦、吊膀子、軋姘頭的，不肯剪辮；要學假道學，自命孝廉方正的，不肯剪辮；死要性命，怕疑累革黨的，不肯剪辮；外此政界、公司總理、店號擋手、洋行買辦、管事西崽、馬夫車夫、烏師帳房、醫士、堂倌、茶房、村學究、案目、地保、綠營等，都不肯剪辮。¹²⁴

不過，北方各省的剪辮行動，之所以難與南方各省相比，和地方官員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辛亥革命期間，頭髮可說是政治力量的角逐場，在北軍控制的城市裏，時有動輒殺戮剪辮人士的行為。例如清軍攻入漢陽後，「見無辮人不問軍民，概行殺戮。」¹²⁵張勳更是在率軍進駐南京後殺人無數，只要是看到沒有辮子的男子，立刻就地處決；張作霖的軍隊則是在哈爾濱，凡是遇到剪辮男子即當街公開殺戮。¹²⁶這些北方軍事將領懲治剪辮人士的雷厲風行，無疑是遏阻剪辮行為擴大至北方的主因之一。然而，也並不是只有上層人士反對剪辮，一般士兵也對剪辮多所疑慮，例如吉林一地在宣統退位後，都統孟懷遠曾下令各營士兵，宣布現今「已改共和，全國均已剪髮，兵隊尤應首先剪去，以為民倡。」卻遭到大批士兵鼓噪反對「謂剪髮後不能歸農，將為鄉里恥笑。」¹²⁷可見一般士兵的保守程度。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守舊的地方鄉紳極力抗拒剪辮，如江蘇南通「該地前清武舉人樊培生為

122 《民立報》，1911年12月12日，版1。

123 《民立報》，1912年1月3日，版2。

124 《時報》，1911年6月15日，版2。

125 《民立報》，1911年12月25日，版1。

126 《民立報》，1911年12月28日，版1。

127 《天鐸報》，1912年5月24日，版2。

首，聚眾搶劫，並揚言須將剪辮之人逕行殺害。」¹²⁸

辛亥革命前後，各地依違於剪辮留辮之間，出現了许多怪現象，例如清軍將領張彪「以軍士剪髮者多，而朝廷又無明文准其剪髮，思為兩全之計，傳諭軍中，令一律剪去腦後長髮，留前頂前髮，綰作丫（環）髻，藏於腦中，奇思妙想，實為剪髮史上放一異彩。」《大公報》戲稱張彪的部隊為「丫家軍」。¹²⁹

在革命的最中心—南京及上海等地，也有不少將革命理解為是恢復漢族傳統，一位南京耆老堅決抵制剪辮：「惟上流社會中之頑固黨，下流社會中之勞動界，近復異想天開，將髮辮高挽至頂際，方巾寬袍，自稱漢代衣冠，勞動界遂以某老先生反對為藉口，紛紛反對剪髮。」¹³⁰上海各界在知名的公共花園—張園舉辦慶祝光復大會時，會場有一人頭戴方巾，身穿大襟袍，以復古裝束現身，卻引來會場人士的陣陣訕笑。¹³¹

表圖1 紀事畫—漢代衣冠



資料來源：《時報》，1911年12月15日。

128 《申報》，1912年1月6日，版2。

129 《大公報》，1911年3月6日，版1。

130 《民立報》，1911年12月28日，版2。

131 《時報》，1911年12月15日。

浙江寧波則有保守鄉紳組織束髮會，召開束髮大會，與革命政府大唱反調。¹³²上海也有一個剪辮奇聞，有一商人畏懼其妻之凶悍，不敢剪辮，某日在路上被人強制剪去辮子，其河東妻大罵「婦怒益烈，乃亦將髮剪去，眾人搶救已自不及，曰彼既做和尚，不許我做尼姑耶！」¹³³甚至有報載鄉人在剪辮後，因為妻子的譏笑而自殺。

這股剪辮的風潮，據當時任職北京外務部的顏惠慶回憶：「剪髮易服也發生不少笑話，理髮師、裁縫乃至皮鞋匠，工作頗形忙碌。許多人不知如何梳洗剪短的頭髮，索性剪成光頭，有如佛寺裏的和尚。各色奇裝異服，觸目皆是。官場中，有人穿上西式的晨禮服，卻配上一頂鴨嘴帽。由於北京氣候寒，晚禮服內，有人吊上狐皮襯裏，頓使身軀臃腫；於晚餐禮服時，則配有直條紋的呢褲。諸如此類，可謂自作聰明，一方面由於時人的喜新厭舊，一方面也可說一切均在轉變之中。」¹³⁴

六、剪辮的另一種意義：時尚的追逐

被晚清革命黨人視為萬惡不赦的辮子，竟然也可以有著流行時尚的作用，當在日本的革命黨人，競相以明末清初蓄辮的血淚歷史，來控訴滿清政府的暴虐統治時。國內卻早已有一批難以歸類的時髦男子，將辮子做為流行的伸展臺，藉由審美意識的展現，達到另一種挑釁權威的目的。

在周作人的回憶裏，提到1901年他從家鄉紹興到位於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讀書時，已經有許多人的辮子是怪形怪狀了，有一個聽差「模樣很是奇異，所以特別記得，他的辮髮異常粗大，而且編得很鬆，所以腦後至少有一尺頭髮，散拖著不曾編，這怪樣子是夠驚人的。那時有革命思想的人，很討厭這辮髮，卻不好公開反對，只好將頭髮的『頂搭』剃得很小，在頭頂上梳起一根細小的辮子來，拖放在背後；當時看見徐錫麟，便是那個模樣的。如今所說鬆編的大辮子，卻正是相反，雖然未必含有反革命的意義，總之不失為奇裝異服的一種，有些風厲的地方官，看見

132 《民立報》，1911年12月28日，版2。

133 《時報》，1912年1月21日，版2。

134 顏惠慶，《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72。

了就要懲辦的。」¹³⁵

周作人的回憶提醒我們在晚清的剪辮易服風潮中，是否在種族革命與國族意識之外，另有一種與政治動機無關的時尚意識，與之並行不悖，展現一股移風易俗、審美觀念的強大能量。在柴小梵的筆記叢談《梵天廬叢錄》裏，也提到在清末的最後十年裏，男子普遍流行在前額留髮，形似劉海。當時還流行一首「前劉海歌」，以嘲諷這些愛美程度一點也不輸給女子的時髦男性：

毛髮排雲軟覆額，如今竟作時髦妝，
少年殷勤苦求效，不畏千人萬人笑，
對鏡朝朝自梳掠，妝成真與花爭貌。
可憐學子嬌青春，覆髮亦仿尋常人。¹³⁶

也許文字的世界還是讓我們難以想像晚清男子如何將一成不變的辮子，轉為顧影自憐的愛美追求，下面這幅《神州日報》上的插畫，倒是將晚清時尚男子的髮型，生動的呈現於眼前。

圖2 上海男子前劉海之變遷



資料來源：《神州日報》，1910年4月，版4。

清末許多紈袴少年在頭髮上大做文章，引起不小的風波。少年男子的新式髮式，可說是無奇不有，最早是1902年河南開封、鄭州等地，許多少年男子「頭蓄

135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45-148。

136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860-861。

短髮、梳令下垂者」。¹³⁷天津則是有「無賴棍徒，打散辮身，穿鑲嵌花邊簇新衣衫」¹³⁸招搖過市、肆行無忌。「爾來省垣（保定）忽有多數少年將辮旁頭髮剪留四五寸，分披於辮之左右。」但是天津警察總辦看到後，認為「與拳匪當日之裝束無異」，判斷「此等少年志在趨時」。¹³⁹

1908年後少年男子更是留起各種造型的瀏海，幾乎難辨男女。山東地區有許多富家子弟「留齊眉穗，並於兩側附絲帶，油光粉亮，無異於女子」。¹⁴⁰天津則是有「紳衿官幕之紈袴子弟，皆於髮辮外留齊眉穗，刷得亮光，男女無別，靦不知恥。」¹⁴¹北京更有浮薄少年「額前垂髮，俗名瀏海，形同婦女，類近娼優，不知羞恥，實屬有傷風化。」¹⁴²「杭州人之剪去髮辮者不多，而剪去者多自成一式，髮作人字形，從中心披下，並無頭顱，自遠望之，無異瀏海。」¹⁴³這和當時流行的女子剪刀式髮型無疑有異曲同工之妙。

1908年山東巡警道更是發布告示，三令五申地將這些額前留髮的浮薄少年，不但比喻為與婦女無別，更是近似娼優，凡是一經發現，立即從嚴懲辦，但清廷政府的威脅恐嚇，似乎嚇阻不了時髦男子追求時尚的強力動力。

137 《大公報》，1902年6月26日，版1。

138 《大公報》，1902年8月31日，版2。

139 〈白門少年之怪狀〉，《大公報》，1905年7月27日，版2。

140 《大公報》，1908年5月2日，版2。

141 《大公報》，1908年5月30日，版2。

142 《大公報》，1908年7月15日，版2。

143 《時報》，1911年4月12日，版3。

圖3 山東巡警道告示：禁止前劉海



資料來源：《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卷36上（1908年），未註頁數。

《民立報》在談及少年這種時尚心理時，倒是以一種較寬容的態度面對：「夫識時者，人中之俊傑，趨時者，少年之恆情，而改裝及時，美也。」¹⁴⁴依據這個評論者的觀點，晚清少年在外表（剪辮）上的求新求變，與追求其他的新奇事物，在本質上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趨新識時的時髦表現罷了。

除了北方的各大城市外，上海的報紙也提到這樣的現象：「寧垣（南京）自剪髮之風氣一起，側身軍學界者均一唱百和，逐次將髮剪去者，頗不乏人，每屆星期，茶坊酒肆大都新樣頭顱，互相鬥勝，甚至興高采烈時，勾肩搭背，同立著衣鏡前，評論短髮之入時與否，滔滔不已，其一種自愛自憐現象，真有不可言語形容者。」¹⁴⁵「滬上學生剪髮後必欲易服，以炫耀儕輩。」¹⁴⁶種種現象都在暗示我們，剪辮易服不只是反滿的革命象徵，更是新時代裏年輕學子追求時髦的絕佳舞臺。

南社社員柳亞子也在回憶裏提到，他在1903年剪辮後，就一直是以「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再加上一件大紅的斗篷。」的裝束行走於各地，當辛亥革命爆發後，柳亞子受雷鐵崖等人之邀，前往南京臨時政府工作時，秘書長胡漢民等人一直懷疑柳亞子是位小姐，甚至引起衛道人士跑來抗議的一番風波。連柳亞子也不得不

144 《民立報》，1910年12月31日，版1。

145 《民立報》，1911年1月10日，版1。

146 《民立報》，1911年12月30日，版1。

承認，他那時的裝束「的確有些迷離撲朔、莫辨雌雄。」¹⁴⁷

當時年輕男子的愛美程度，可以說是從頭到腳，無處不可以做文章，正如圖四所示，圖中男子留著一頭齊眉穗的造型，除了在髮型上極盡變化外，該篇報導還記載當時男性流行一種新式尖履，與纏足女鞋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晚清男子為了追求美觀，幾乎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圖4 誰知烏之雌雄



資料來源：《人鏡畫報》，1910年9月，未註頁數。

山西士人劉大鵬也同樣觀察到晚清這股男子愛美奢華的風氣：「斯時男子專事奢華，事事效法洋夷之所為，只求款式靡麗，草野人民亦多仿而行之。」¹⁴⁸輿論也說這些男子無異於「人妖」。¹⁴⁹1911年4月，《時報》曾在副刊上刊登了一系列「男女服飾新裝束」的專欄，顯示清末的男子髮型與服飾現象，已經是呈現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的奇景，其中對男子髮型的報導有齊眉形、彎月形、人字形等各種瀏海的造型，還有髮型與服裝的配合，形容當時上海共有四種新人物：有辮之西裝、無辮之華裝、有辮之華裝及無辮之西裝等四種。¹⁵⁰這些紈袴少年未必意識到男子髮

147 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9。

148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158。

149 《申報》，1911年4月20日，版1。

150 《時報》，「滑稽時報」，1911年4月11日，版4。

型上的政治意涵，但他們以一種誤打誤撞的姿態，顛覆並嘲諷了原本凜然不可侵犯的辮子；以趨新的觀點展示時尚的動力，從他們的身上，展現了另一種新時代的摩登感性。

七、結 論

回顧清末民初風起雲湧的剪辮風潮，雖然革命黨人以及日後的主流論述都將剪辮等同於排滿革命與種族象徵，將剪辮局限在政治意義的範疇內，但這並不表示當時人也完全認同這種看法。事實上，從晚清剪辮的歷史裏，我們看到了一種嬉笑怒罵、語意尖酸、玩世不恭的時代風格。許多剪去辮子的實行者或鼓吹剪辮的宣傳家，他們不是用橫眉怒目、感時憂國的嚴肅情緒，在向清廷的權威挑戰，而是以各式各樣的嘲諷笑聲，澈底顛覆了一切的權威，藉由身體的各種扭曲、誇張與醜化的表現，呈現了這個新時代的革命精神。

即以剪辮的言論來說，我們就能找出許多滑稽、搞笑的另類宣傳，革命黨人吳稚暉在法國所辦的《新世紀》中，用諷刺詼諧的語調，以反面的手法，試圖證明辮子還有許多足堪利用的功能：

天下無無用之物，無論竹頭、木屑、布片、紙塊。以格致之微妙，能還原或作別用，從無廢物。然則以黔如漆、纖如絲、長以尺計之辮，下垂於背，雖大小、長短、粗細光毛不一，要之為世界所不可少之一物，謂為無無用耶？余不能信。余思索良久，得其應用處十有五。¹⁵¹

他所舉的十五項功能包括：綁犯人的繩子、上吊的繩子、購物包紮之用、趕馬之馬鞭、馬戲團之繩索、做圓規之用等等，其他用途過於匪夷所思，茲不贅述。這篇「辮子新用途」就以內容而言，當然是文氣浮誇的遊戲之作，僅供博君一笑，但它用戲謔的方式，澈底顛覆原本不容質疑的辮子。

國內方面有關剪辮的想像報導，就搞笑的程度而言，比起吳稚暉來，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時報》的副刊中，也曾就辮子的用途，刊載過名為「廢物利用」的

151 吳稚暉，《新世紀》，第95號（1909年），未註明頁數。

專欄，獎勵讀者如有好的點子，盡量來函以共襄盛舉，於是辮子可以做糞桶索、皮箱帶、供拔河用之繩索等。除了對辮子的誇張想像外，滿清官員的朝服佩飾也成為「廢物利用」專欄取笑的題材，包括：掃帚可以做花翎，補服可以做坐墊，鍊條可以做朝珠，匾額可以做棺材等。《申報》〈自由談〉上也有同樣戲謔的文章：

外套可以改大衣，頂子可以改算盤珠，帽襪可以改拖糞，翎子可以改掃帚，補子可以改坐墊，旗桿可以改電桿，銜牌可以改驢馬停留牌，涼帽可以改死人足上套的斗，朝珠可以改牽猿猴的鍊條。¹⁵²

《時報》副刊更嘲諷地說，身為大清國民之法定要件：「一、屬於形體上者：辮子。二、屬於服式上者：瓜皮帽、長袍、外套、馬蹄袖、背心、翎子、朝珠、補服、馬褂。」¹⁵³

晚清輿論界對於辮子何去何從的用途建議，當然不值得我們認真一顧，但這些嘲笑辮子及官服的專欄，本意就不是要讓讀者正襟危坐的閱讀，而是隨著作者一同發出陣陣的嬉笑，藉由對身體的醜化，澈底顛覆既有的權威與價值，也讓人不禁嘆服晚清人物要命的想像力。

晚清中國人在外表上的變化，不只反映了國家再造的過程中，對新國民身體的一種想像與建構，也和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的商業活動與消費文化的需求有關，過去都將這兩個層面視為各自獨立的研究領域，但在清末民初的一段時間裏，這兩個影響晚清時人身體外形變化的因素與動機，卻出現了不再是那麼涇渭分明的交融現象。

政治可以變成是一種時尚，辛亥革命後，報刊大多以這樣的口吻來形容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西化的裝扮：「革命鉅子，多由海外歸來，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慣習，喜用外貨，亦無足異。無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為非此不能側身新人物之列。」¹⁵⁴一身革履西服變成剛誕生的共和國民標準打扮，這也反映清末民初期間，時人對西方文明的追求，是到了如何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但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早已事先提醒我們，剪辮易服也可能是改革派知識分子追逐新潮與時髦的展

152 《申報》，1911年12月11日，版1。

153 《時報》，1911年5月10日，版1。

154 〈論維持國貨〉，《大公報》，1912年6月1日，版2。

現，他們最終的用意，不過是想利用剪辮易服來獲取名聲與利益。¹⁵⁵

西式的服裝成為最新詞彙自由、平等與共和的象徵符號，青年男女對西方文明的追求，處處都反映到對自己外表的求新求變上，如何做一個文明人與時髦派，成為清末民初言論空間裏的熱門話題，在《申報》〈自由談〉裏，有一篇「時髦派」的文章說：

現在我們居然是個共和國民了，各種東西都要改良改良，頂要緊的是身上的裝飾。今先說女界上所不可少的東西：尖頭高底上等皮鞋一雙、紫貂手筒一個、金剛鑽或寶石金扣針二三只、白絨繩或皮圍巾一條、金絲邊新式眼鏡一副、彎形牙梳一只、絲巾一方。

再說男子不可少的東西，西裝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個，夾鼻眼鏡一副，洋涇話幾句，出外皮蓬或轎車或黃包車一輛，還要到處演說。¹⁵⁶

這段話生動地描述出所謂新時代的共和國民，不過是一連串西洋物品的堆砌與組合罷了。

歷來的研究都將剪辮視為反清革命的最重要象徵，事實上，剪辮的豐富意涵遠不止於政治與種族的單一意義，在清末民初的轉變過程中，剪去辮子成為躋身新派人物的一種姿態與表演。過去往往忽略了剪辮背後，還有許許多多隱而未彰的心理動機，包括時尚流行的展現、審美意識的傳播、妖術的歷史記憶、性別的倒置及反映階級的關係等，正是在這些因素錯綜複雜的交融互動下，共同影響並左右了晚清剪辮風潮的動向。（責任編輯：歐素瑛）

155 李伯元，《文明小史》，頁93-117。

156 〈時髦派〉，《申報》，1912年1月6日，版1。

徵引書目

壹、中文資料

（一）政書、叢書、資料彙編

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第2、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

中國史學會編，《中日戰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2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辛亥革命資料類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編，《清末教案》，第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勒德洪等纂，《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第5卷。臺北：華文書局，1969年。

鄭秦、田濤點校，《大清律例》。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

寶璽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6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

（二）文集、年譜、自傳、日記、回憶錄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上冊。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

丁韞良，《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奏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8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王韜，《漫遊隨錄》，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選》，第11帙，第62冊。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

- 王韜，《淞隱漫錄》。臺北：廣文書局，1976年。
- 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
-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990年。
- 吳玉章，《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年。
- 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87年。
- 吳趼人，《吳趼人全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
- 志剛，《初使泰西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帙，第56冊。臺北：廣文出版社，1962年。
- 李伯元，《文明小史》。臺北：博遠出版公司，1987年。
- 李伯元，《李伯元全集》，第3、5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沈茂駿編，《康南海政史文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
- 何如璋等著，《甲午以前日本游記五種》。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周作人，《知堂回憶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柳亞子，《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容閔，《西學東漸記》，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9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徐繼畲，《瀛環志略》。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
- 張德彝，《航海述奇》，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選》，第11帙，第55冊。臺北：廣文出版社，1962年。
-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
- 許壽裳，《許壽裳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
- 章太炎，《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
- 馮自由，《革命逸史》，2集、3集、4集、5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 斌椿，《乘槎筆記》，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選》，第11帙，第55冊。臺

北：廣文出版社，1962年。

《鄒容、陳天華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

蔣夢麟，《西潮》。臺北：世界出版社，1966年。

魯迅，《魯迅文集》，第1、2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魯迅，《魯迅作品全集》。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0年。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顏惠慶，《顏惠慶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年。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三）專書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年。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年。

王爾敏，《近代文化生態及其變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

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著、鞠方安譯，《真正的中國佬》。北京：光明日報，1998年。

李孝悌，《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李長莉等著，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年。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現代化的初探》。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2年。

張玉法，《辛亥革命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陳伯熙，《上海軼事大觀》。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

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鍾叔河編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前驅者》。臺北：百川書局，1989年。

瞿君石，《青年之神：鄒容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年。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陳蘇鎮、薄小瑩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四）期刊、專刊、學位論文

王爾敏，〈斷髮易服改元一變法論之象徵旨趣〉，《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討論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

吳善中、黃蓉，〈淺論辛亥革命前夕狂飆突起的剪辮運動〉，《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卷第2期（2002年3月）。

李喜所，〈辮子問題與辛亥革命〉，《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6期。

李樹，〈髮式與民族心理〉，《青島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2期。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12月）。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邱巍，〈辛亥革命後的「剪辮易服」潮〉，《史林》，2000年2期。

金觀濤、劉青峰，〈新文化運動的另一種圖像〉，收入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編，《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2000年。

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渤海學刊》，1995年第3、4期。

張小虹，〈魯迅的頭髮〉，《聯合文學》，2002年4月號。

張松祥、龔鵬，〈剪辮風潮與反清革命〉，《雲夢學刊》，第23卷第6期。

黎志剛，〈想像與營造國族：近代中國的髮型問題〉，《思與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

蘇萍，〈清代妖術恐慌及政府的對策：以兩次剪辮謠言為例〉，《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12月號。

（五）報刊、雜誌

《人鏡畫報》，1907年。臺北：中國研究資料中心重印，1967年。

《大公報》，天津，1906-1913年。

《中國日報》，1904、1907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重印，1968年。

《中國旬報》，1901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重印，1968年。

《天民畫報》，1908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1年。

《天鐸報》，上海，1911-1912年。

《月月小說》，1906-1908年。

《民立報》，1910-1913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影印。

《民吁日報》，1909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重印，1969年。

《民呼日報》，1909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重印，1969年。

《民報》，1-8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

《民權報》，上海，1912-1913年。

《民權畫報》，1912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

- 中心重印，2001年。
- 《北京白話畫圖日報》，1909年。《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3年。
- 《申報》，上海，1874-1913年。
- 《江蘇》，1-12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
- 《神州日報》，上海，1907-1911年。
- 《政治官報》，1907-1913年。
- 《時報》，上海，1904-1912年。
- 《浙江潮》，1-10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
- 《淺說畫報》，1909-1910年。《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3年。
- 《菊儕畫報》，1909年。《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3年。
- 《婦女時報》，1911-1913年。
- 《湖北學生界》，1-6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年影印。
- 《飛影閣畫冊》，1890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1年。
- 《開通畫報》，1910年。《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3年。
- 《黃帝魂》，1903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
- 《新聞報》，上海，1908-1911年。
- 《新聞畫報》，1908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重印，2001年。

《圖畫日報》，1909-1913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重印。

《圖畫新聞》，1908-1909年。《清代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1年重印。

《醒俗畫報》，1907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重印。

《醒華日報》，1910年。《清末民初報刊圖畫集成》，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年重印。

《舊京醒世畫報》，1909-1910年。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重印。

《點石齋畫報》，1884-1898年。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重印。

《警鐘日報》，1904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重印。

貳、英文資料

Chen, Jerome. *China and the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London: Hutchinson, 1979.

Cohen, Paul A.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Diko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Rankin, Mary Backus. *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Wakeman, Frederic E.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Wright, Mary.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